

##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国际企业战略家和投资银行家，并是一位有名的“中国通”。他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会中受到习近平主席接见，并获得由习主席亲笔签发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该奖章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突出贡献个人的最高荣誉，四十年间只颁发给 10 位外国友人。库恩博士为 10 位中仍健在的 5 位友人之一，并且是仅有的 2 位美国人之一。

库恩博士在 BBC、CNN、CGTN、CCTV、彭博、CNBC、福克斯商业新闻和其他媒体担任评论员，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担任高级政治以及经济评论员，并且是《中国日报》和《南华早报》的专栏作家。

30 年多来，库恩博士一直与搭档朱亚当先生一同，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合作，并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议。他曾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发售仪式上发表讲话。2015 年，他在访问美国期间于 CNN 上发表了关于习近平政策实施的现场评论。2016 年，他向外国观众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2018 年，他多次于各大英美主流媒体发表有关中美关系的时事评论，其中包括贸易战。

在中共十九大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库恩博士接受了广泛的采访，其中 24 次接受 CNN 和 BBC 世界新闻频道采访，他的言论被美国、香港、意大利、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和网站引用。库恩博士对于中共十九大的长篇深入分析，被刊登在《中国日报》上，以《新一代发展的历史起点》一文作为十九大开始的报道；以《通往 2050 年的新时代》结束十九大的相关报道。他在党代会开幕式时的文章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库恩博士创作了《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中国 2005 年的畅销书《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库恩博士在 2015 年为《解读中国共产党》系列丛书编写简介。

库恩博士与朱亚当先生及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共同创作了获奖作品《中国面临的挑战》系列纪录片，该纪录片在中国和国际上均获得广泛传播。库恩博士担任纪录片策划兼主持人。《中国面临的挑战》获得 2013 年，2018 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15 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第二季赢得了 2016 年洛杉矶地区艾美奖；2017 年，2018 年泰利影视奖。该系列纪录片将在 2019 年播出第三季《习近平理论与中国 2020/2050》。

库恩博士是中国国际电视台《走近中国》栏目的联合制片人和主持人（朱亚当先生作为联合制片人）。该栏目每周都设有对中国思想领袖和决策者的特别访谈，并在全球范围内播出。《走进中国》着眼于中国政治与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经济与社会、改革和发展、国际关系与事务等问题，并重点关注习近平主席的政策方针和治国理念。

目前，库恩博士、朱亚当先生及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正在共同制作关于习近平主席“精准扶贫”计划的特别纪录片。库恩博士担任主持人以及撰稿。

库恩博士与亨利·基辛格并称美国人中最早的“中国通”，并被《瞭望东方周刊》评选为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最深远影响的十位支持者之一。（他是其中唯一健在的支持者）

库恩博士同时也是一位国际公司战略家和投资银行家，他与国际上许多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企业最高管理层合作，运用他的“政治战略框架”来制定和实施中国战略。他是美国最大的中型市场 M&A 公司的总裁与合伙人（公司于 2000 年卖给花旗集团）。

库恩博士创作了电视系列纪录片《Closer To Truth》，并担任撰稿和主持。这部纪录片自 2000 年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开播，内容主要涉及科学和哲学领域，目前已经播出超过 275 集，并且仍在持续制作中。库恩博士写作和编辑了 30 多本关于中国、企业战略、金融、科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与哲学家约翰·莱斯利共同创作的《存在的奥秘》。

库恩博士是库恩基金会的主席，该基金会支持对科学、哲学、古典音乐以及中美关系的研究。库恩基金会制作了讲述俄罗斯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艺术人生的特色纪录片《哈恰图良》。该片获得了好莱坞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库恩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人类生物学学士学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解剖学和脑研究学博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大道之行

# “中国的精准扶贫是非凡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志伟

“中国的发展，是令人震惊的、史诗般的故事，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所经历的最伟大变革。”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如此看待中国的发展，并长期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他所见所感的真实中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库恩表示，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件事情上，“习近平主席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建议”，也正是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与治国理政实践中，库恩感受到了中国故事的魅力。

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库恩从习近平主席手中接过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当我走到舞台正中时，习近平主席微笑着伸出手和我握手。在合影环节，习近平主席再次与我握手，鼓励我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库恩回忆说。

“我一直把这枚奖章当成一种荣幸，它的象征意义比我获得它更为重要。”库恩认为，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在每一件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事情上，中国都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讲好中国的真实故事至关重要，要讲出中国的活力、富饶与复杂性。”

库恩回忆，他是在2005年第一次见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2006年，库恩在纽约再次见到了习近平。“当时，我们正在帮助筹办浙江省与新泽西州共同举办的‘浙江周’。我感受到了他对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关注，以及对国际贸易的重视。”库恩是《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和《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两本书的作者。在观察和写作中，库恩深刻认识到习近平主席的执政理念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的议题，如扶贫、共同富裕、创新、环境保护等，与他在浙江工作时所强调的政策有很强的一致性。”

2014年10月，库恩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参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多语种全球首发式。他表示，这本“前所未有的图书”是一个里程碑，呈现了习近平主席的政治哲学，向世界传达出了他的思考方式。

习近平主席的两个演讲给库恩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演讲是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向美国工商界领袖发表演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请我去对演讲进行直播点评。聆听演讲，我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第二个演讲是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外媒体做评论员。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他的话坚定有力，引起了现场广泛的共鸣，令人振奋。”

多年来，库恩一直密切关注习近平主席的思想理论和中国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并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精准扶贫、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主题撰写大量文章，“所有这些是中国应对挑战的新方法，都是生动的中国故事。”

“中国的精准扶贫是非凡的故事。过

去40多年里中国减少了数亿贫困人口，最让我感慨的是习近平主席的一句话：‘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库恩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习近平主席这样在扶贫上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而至。库恩坚信，中国将遏制住这场迅速蔓延的疫情。“我看到了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与中国脱贫攻坚战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习近平主席的坚定承诺和领导，有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中国一定会战胜疫情。”

库恩表示，从促进地区和全球发展的目的出发，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愿景，这些思想和实践对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将愿景转化为现实。“我会持续观察中国，讲述中国奇迹。”库恩说。

（本报华盛顿电）

# “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 车 斌

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举行期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刘华参加了主题为“亚洲知识产权：趋势与机遇”分论坛。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届论坛年会将引领亚洲新经济和知识产权建设，为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智慧和力量。

刘华表示，知识产权在未来重建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持续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

球排名已经从2013年的第三十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当中唯一进入前十五的国家。中国为世界创新版图作出重要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源于中国不断完善现代知识产权体系建设的努力。中国的创新创造已表现在创新生态体系的各个环节。”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刘华表示，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持和推动，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应用。“我

们欣喜地看到，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知识产权在促进产业升级、创造就业、提高商业竞争力、促进经济绿色复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刘华说，“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积极有益的努力，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北京冬奥会期间，中方向来华出席开幕式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交存了马拉喀什条约批准书，并正式完成海牙协定加入程序，马拉喀什条约和

海牙协定都将于今年5月5日在中国正式生效。刘华表示，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建设的积极姿态。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提高了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影响力，牢固确立了知识产权大国地位，为世界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980年6月3日，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式成为该组织第九十个成员国。“40多年来，双方建立了深厚友谊和良好合作关系，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刘华指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中国创新创造和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充满信心，愿不断加强与中国协调与合作，提高知识产权组织全球服务体系在华的申请量，更加及时、高效地利用知识产权为中国科技创新赋能，助力中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日前，位于塞内加尔法蒂克大区方久尼省的小城方久尼热闹非凡。穿城而过的萨卢姆河上，一座崭新的大桥横跨两岸，在蔚蓝的天空下划出美丽弧线。由中国提供融资支持、中企承建的方久尼大桥正式开通。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表示，大桥是塞中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也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有力体现。

方久尼大桥全长1600米，是目前塞内加尔最长的桥梁，已成为连接塞南北方的主干道之一。作为“塞内加尔振兴计划”优先重大项目，大桥是连接邻国冈比亚、几内亚比绍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中方积极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具体体现。大桥的通车大幅缩短了塞内加尔沿海地区南北行车时间。“以前坐渡船过河要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现在开车通过大桥只需几分钟。”方久尼省省长助理恩迪亚耶深有感触地说，这座桥方便了民众出行，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

大桥不远处，几只彩色独木舟漂浮在河面，不少当地人前来体验乘船过河并拍照留念——不久后，这些船只将不再用作交通工具。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过河需要乘独木舟，车辆和货物过河需等待至少一个小时才能挤上狭小的混装船，费时费力，安全也难以保障。大桥开通解决了长期困扰民众的过河难题，当地居民加梅高兴地说：“过河难已成为历史，我们再也不用摆渡过河了。”

“如今，开车、骑车，甚至步行都可以很快到达对岸。夜间大桥上还会亮起绚烂的灯光，不仅为安全出行提供方便，还为河上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当地居民吉尔伯说：“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买一台新车，享受大桥带来的便利条件。”

中铁七局武汉公司方久尼大桥项目部经理陈绪仁表示，萨卢姆河河床地质复杂，桥墩深基坑施工时遇到多个技术难题。面对疫情等挑战，中塞双方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确保大桥顺利完工通车。塞内加尔籍项目劳工部管理員迪奧普说，在3年多的建设过程中，超过8000名当地民众获得工作和培训机会，不少人还成长为技术专家，未来可以继续为当地建设贡献力量。

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肖晗表示，方久尼大桥是一座典范之桥、希望之桥、友谊之桥。这座雄伟的大桥不仅横亘在萨卢姆河上，也架设在中塞两国人民心中。塞内加尔最大媒体《太阳报》的报道认为，大桥的建成为萨卢姆河流域经济贸易往来注入动力，将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 萨卢姆河上的亮丽风景

本报记者 周 轶 黄培昭

## 伊朗总统莱希会见魏凤和

新华社德黑兰4月27日电（记者王守宝）4月27日，伊朗总统莱希在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莱希说，伊中两国患难与共，在国际事务中立场相近、相互支持。伊方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外部干涉，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在伊困难时期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加强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全方位合作。

魏凤和说，中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总统阁下互通电话、互致信函，引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取得新进展。此访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背景下的重要访问，体现了中伊两国关系的重要，体现了相互坚定支持和携手共进。中方坚定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愿与伊方团结协作，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共同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近年来，中伊两军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中国军队愿与伊方保持战略沟通、用好合作机制、推进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会见魏凤和，伊朗国防部长阿什蒂亚尼为魏凤和举行欢迎仪式，并进行正式会谈。会谈会见中，双方就国际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伊核问题、乌克兰局势等深入交换意见，并就两军高层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军兵种交流、联演联训、人员培训等务实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 宋涛同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常委洪玛奈视频通话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4月26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同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常委、中央青年工作组组长洪玛奈举行视频通话，宋涛宣介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双方就弘扬中柬传统友谊、加强两党交流合作、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深入交换意见。

（上接第一版）对失业保险参保不满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对因疫情影响暂时失业、未参保的困难人员，给予临时救助。五要压实各地稳就业责任，作为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创造性落实，确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

会议指出，交通物流是市场经济的经脉，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撑。针对近期部分地区物流受阻，国务院建立了工作机制。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物流畅通保供，加强部门协同和跨区联动，畅通国际国内物流。一要保障交通骨干网络高效运行。督促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应开尽开，疏通机场、港口集疏运，支持平台、快递等企业增加运力。二要打通物流微循环。推动因疫情关停的快递等网点有序恢复运营和快递员返岗。保障农村公路畅通和农资农产品运输。三要强化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物流保障。备足用好应急物资中转站，实行非接触式接驳，确保民生物资、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货物、进出口产品等运输。四要加强对货运经营者帮扶。5月1日至年底，对符合条件的快递收派业务收入免征增值税。尽快推出1000亿元再贷款支持交通運輸，物流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五要确保车辆通行证应发尽发、快申快办、全国互认。推广对货车司机运输过程中免费核酸和抗原检测。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日前，安徽铜陵港长江外贸码头，机械设备正在装卸货物。今年一季度，铜陵港集装箱吞吐量1.08万标准箱，外贸进出口吞吐量10.09万吨，分别增长45.9%、47.5%。

### 外交部发言人——

## 中方将同巴方一道全力追凶，让幕后黑手付出沉重代价

本报北京4月27日电（记者张远南）就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班车遭遇恐怖袭击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7日表示，这是一起蓄意预谋、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性质十分恶劣，行径令人发指。中方将同巴方一道全力追凶，让幕后黑手受到正义严惩、付出沉重代价。

汪文斌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

“我们再次对两国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汪文斌说，这是一起蓄意预谋、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目标直接指向教师这一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和文化交流的促进者，性质十分恶劣，行径令人发指。

汪文斌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和驻巴使领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派员赶赴现场处置。中国外

交部负责人和驻巴使领馆负责人多渠道要求巴方全力做好救治和善后工作，立即彻查此事，缉拿凶手并依法严惩。同时采取更有力措施，全力保障在巴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绝不让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驻巴使领馆并提醒中国在巴机构和人员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安保等级，确保自身安全。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迅速行动，分工协作，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昨天前往医院看望了受伤的中方教师，伤者目前已得到妥善救治，正在康复中。

汪文斌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4月26日当晚到中国驻巴使馆吊唁，强调巴政府正动用所有力量，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将不惜一切代价缉拿凶手，对肇事者严惩不贷。巴政府承诺将全力配合做好善后工作，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对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的安保工作，绝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伟大的中巴友谊与合作。

汪文斌强调，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中方坚定支持巴方反恐努力，将同巴方一道全力追凶，让幕后黑手受到正义严惩、付出沉重代价。“我们也再次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严密防范安全风险。”





## 第03版:要闻

### 本版新闻

- 携手做大全球经济蛋糕（国际论坛）
- “中国的精准扶贫是非凡的故事”（大道之行）
- “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 萨卢姆河上的亮丽风景
- 图片报道
- 伊朗总统莱希会见魏凤和
- 宋涛同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常委洪玛奈视频通话
- 中方将同巴方一道全力追凶，让幕后黑手付出沉重代价

-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2）

人民日报 2022年04月28日 星期四

01版：要闻	02版：要闻	03版：要闻	04版：要闻
05版：评论	06版：要闻	07版：视觉	08版：要闻
09版：理论	10版：要闻	11版：政治	12版：文化
13版：生态	14版：体育	15版：广告	16版：广告
17版：国际	18版：民主政治	19版：法治	20版：副刊

返回目录

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下一篇

## “中国的精准扶贫是非凡的故事”（大道之行）

本报记者 李志伟

《人民日报》（2022年04月28日 第03版）

“中国的发展，是令人震惊的、史诗般的故事，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所经历的最伟大变革。”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如此看待中国的发展，并长期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他所见所感的真实中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库恩表示，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件事情上，“习近平主席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建议”，也正是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与治国理政实践中，库恩感受到了中国故事的魅力。

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库恩从习近平主席手中接过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当我走到舞台正中时，习近平主席微笑着伸出手和我握手。在合影环节，习近平主席再次与我握手，鼓励我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库恩回忆说。

“我一直把这枚奖章当成一种荣幸，它的象征意义比我获得它更为重要。”库恩认为，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在每一件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事情上，中国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讲好中国的真实故事至关重要，要讲出中国的活力、富饶与复杂性。”

库恩回忆，他是在2005年第一次见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2006年，库恩在纽约再次见到了习近平。“当时，我们正在帮助筹办浙江省与新泽西州共同举办的‘浙江周’。我感受到了他对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关注，以及对国际贸易的重视。”库恩是《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和《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两本书的作者。在观察和写作中，库恩深刻认识到习近平主席的执政理念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的议题，如扶贫、共同富裕、创新、环境保护等，与他在浙江工作时所强调的政策有很强的一致性。”

“盲人摸象”故事启发我深入研究中国

新华社 2022-05-23 08:17 Posted on 北京



新用户点击“新华社”即可关注！



# 我眼中的习近平

XI IN MY  
EYES

## “盲人摸象”故事启发 我深入研究中国

我撰写著作时  
跟习主席的会面给了我很多启迪  
那时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主席  
就展现了他的宏大愿景  
谈及了作为领导者  
需要对中国进行怎样的思考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





##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群像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题：为发展和进步，与中国携手同行——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群像。新华社记者：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阿兰·梅里埃等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以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这10位国际友人来自不同领域，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先进技术与理念，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卓越智慧与力量。

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他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展奇迹”，见证了中华民族追赶时代、引领时代的前行历程和改天换地的时代传奇，更同中国人民一道书写了志合利融的友好故事。他们是千千万万因改革开放与中国结缘的国际友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故事是中国与世界友好交流、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

### （十）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 罗伯特·库恩



↑10月23日，罗伯特·库恩在纽约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新华社记者 李睿 摄

2015年，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与中国媒体合作播出《走近中国》访谈栏目，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数十年间，库恩致力于把一个全面真实、精彩纷呈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改革开放是库恩叙述中国故事的主线。10年前，他出版《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作了生动深刻描述，被认为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范例”。在他看来，要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今，库恩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中国调研交流。他希望能继续把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CCTV 1  
综合

界面直播



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



CCTV 4

中文国际

直播



直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阅兵、群众游行特别节目







# 70 走向伟大复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RJonline CCTV.com 央广网

## [海外人士眼中的新中国 70 年] 罗伯特·库恩：中国用自身发展促进全球繁荣与稳定

2019-10-01 09:44:30 来源：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编辑：赵妍

[更多](#)



2019 年 8 月 12 日，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库恩在纽约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专访。（摄影：钱珊铭）





2017 年 11 月，库恩跟随摄制组在中国的贵州、海南等地拍摄扶贫主题纪录片。（图片由罗伯特·库恩提供）



2017 年 11 月，库恩跟随摄制组在中国的贵州、海南等地拍摄扶贫主题纪录片。（图片由罗伯特·库恩提供）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钱珊铭）：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库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库恩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为全球繁荣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许多外部人士并不能客观看待中国的成功，也无法充分了解中国成功背后的艰辛。因此，他认为，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当代中国故事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2018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图为荣誉证书。（图片由罗伯特·库恩提供）



2017 年 11 月，库恩跟随摄制组在中国的贵州、海南等地拍摄扶贫主题纪录片。（图片由罗伯特·库恩提供）



2017 年 10 月 29 日，罗伯特·库恩在北京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图片由罗伯特·库恩提供）

今年 75 岁的罗伯特·库恩在过去几十年里频繁往来于美中之间，亲眼目睹并经历了当代中国发展的许多重要时刻。库恩说，中国用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为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世界有目共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回望过去 70 年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和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大幅增长，对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多年超过 30%。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球，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都因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得到了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帮助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正如许多人所说，中国保持繁荣和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中国，并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库恩说，中国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国家，其庞大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各领域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因此，不能孤立、片面地解读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以偏概全地看待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更不应该选择性地忽视中国通过自身发展为全球作出的贡献。

结合西方受众习惯，库恩多年来坚持客观讲述真实中国，也确实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一些偏见。库恩说，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既可以是介绍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可以是讲述中国偏远山区的贫困家庭如何在政府的扶贫政策下一步步摆脱贫困的故事。

2019 年 7 月 31 日，由库恩担任主持人和撰稿人的最新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加州电视台首映，迅速在美引起热议。这部纪录片从一名外国人的视角解读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通过跟踪追访五个中国贫困家庭的脱贫故事，讲述了中国为落实在 2020 年前消除极端贫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该片第一次用镜头记录了脱贫第三方评估过程，既记录了扶贫工作的成就，也不回避存在的各类问题。



2018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图片由罗伯特·库恩提供）





2018年12月18日，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图为荣誉证书。（图片由罗伯特·库恩提供）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75岁的库恩两年间跟随摄制组辗转于中国的甘肃、新疆、山西、四川、海南等地探访中国的贫困家庭。在库恩看来，这样的辛苦是值得的，因为精准扶贫是最有力的中国故事之一，也是必须向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这部纪录片有效地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并打破了外部人士对中国的一些固有偏见。有美国观众告诉我，看完这部纪录片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从未想过中国会花这么大力气去扶贫。这部关于中国扶贫的纪录片，提醒人们该放弃对中国的一些偏见了。这部纪录片并没有掩盖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问题，但该片通过真实记录和呈现中国的扶贫计划，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人们可以在片中看到，中国的扶贫工作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落到实处的。事实上，中国构建了一个有效的精准扶贫生态系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我们为能向世界真实地讲述这个故事感到自豪。”

库恩说，中国不仅通过自身发展为全球的繁荣与稳定作出贡献，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为维护全球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海盗，展开反恐行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打击毒

品和有组织的犯罪、致力于流行病防治，积极应对这些可能导致世界产生动荡的重大不稳定因素，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同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成为当前推动实现全球公平化最有力的机制，是一项惠及全球的百年大计。”

库恩说，当未来的史学家回望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将被视作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型之一；而中国人民积极进取的意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贯穿在中国脚踏实地不断前行的每一个坚定的步伐中。



<http://news.cri.cn/20191001/30022228-40cf-eb50-a4e2-dc3d1fd6127b.html>









# China Reform Friendship Medal Recipient: Robert Lawrence Kuhn, watching the real China and telling its true story

CHINA

CGTN

 2018-12-18 13:45 GMT+8 |  Updated 2018-12-26 16:56 GMT+8

Share





China commemorate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a grand conference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on December 18, 2018.

During the celebratory event,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ther Chinese leaders presented 10 foreigners with the “China Reform Friendship Medal,” China's highest award.


The medal honors those who have helped China throughout the country's historic, four-decade transformation. Of the 10 foreigners selected, five are living. Robert Lawrence Kuhn, “an international friend who tells the 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to the world,” is one of two Americans awarded.

Kuhn, born in New York, with a doctorate in brain research (UCLA) and an MBA (MIT), first came to China in 1989, and since then he has worked with China's senior leaders and advi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RELATED STORIES



Kuhn's reflections: On 40 years of reform opening-up

 2018-12-18 00:31 GMT+8




R. L. Kuhn analyzes China's new contradictions and its road to 2050

 2018-01-22 21:09 GMT+8



Pragmatism heralds China's century

 2018-12-03 20:52 GMT+8





03版:要闻 PDF版下载 上一版 下一版

人民日报客户端

新闻导航

我给文章打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提交

《人民日报》(电子版)的一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PDF、图表、标志、标识、商标、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以及为读者提供的任何信息)仅供人民网读者阅读、学习研究使用。未经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及/或相关权利人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将《人民日报》(电子版)所登载、发布的内容用于商业性目的,包括但不限于转载、复制、发行、制作光盘、数据库、触摸展示等行为方式,或将之在非本站所属的服务器上作镜像。否则,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网上公示、向有关部门举报、诉讼等一切合法手段,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日报 周报 杂志

人民日报 2020年03月08日 星期日

往期回

返回目录

版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0)

## “推动人类共同的发展事业不断进步”

——国际人士坚信中国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08日 03版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做出再动员再部署。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国际人士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中国承诺将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充分彰显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相信中国将如期实现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等目标任务,推动人类共同的发展事业不断进步。

“将是对人类减贫事业了不起的贡献”

“虽然中国正在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新的压力,但是通过此次脱贫攻坚座谈会,人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将履行承诺,有针对性地出台帮扶措施,巩固脱贫成果。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的既定目标。”比利时赛百思中欧商务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巴尔丹近年来多次前往中国,并到访过湖南等省份的偏远山区,他说:“中国近年来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将是对人类减贫事业了不起的贡献。”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减少贫困一直是实现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优先事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脱贫攻坚的一项关键战略。习近平主席在扶贫工作上展现的领导力,为中国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增添了动力。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中国史无前例的扶贫行动记录为世界历史上对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最大贡献。

库恩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会对中国的脱贫攻坚产生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在面对疫情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继续推进脱贫攻坚,尤其是对农村地区面临的产业困难加大扶持力度。库恩曾在中国最贫困的县里生活了数周,这让他真正了解了中国精准扶贫是如何运作的。令他深感惊讶的是,中国每一个贫困家庭都有相应档案,且定期更新。大量年轻的党员干部专门从事对贫困家庭的帮扶工作,在贫困农村长期生活。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国扶贫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调动组织力量,大量基层党员贴近贫困人口开展工作。

巴基斯坦执政党正义运动党中央新闻书记艾哈迈德·贾瓦德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脱贫成就令世界瞩目,也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有益的减贫经验。这几年,我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减贫工作。我认为,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源于中国所具有的制度优势——能够将全社会中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广泛动员和团结起来,为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共同努力。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将从中国的扶贫和发展经验中受益匪浅。这将推动人类共同的发展事业不断进步。”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毛里西奥·桑托罗表示,当前,中国正在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期影响,但中国高效的社会治理能力也在疫情防控中得到体现,相信中国将如期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与中国结缘已有 30 多年，我爱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断为全球媒体评析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我深信中国终将战胜疫情并克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世界也应该对此抱有信心。

我之所以对中国战胜疫情有信心，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付出的巨大投入，这首先体现在为阻止病毒传播而进行的惊人社会动员。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严格而坚决措施，全国上下一心、闻令而动。如此规模的社会动员在全球公共卫生史上前所未有。它能奏效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制度优势。同样是依靠这种投入和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在与贫困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自 2012 年以来，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的地方政府和组织展开协调行动，全力帮助近 1 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目前，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也是依靠这一组织架构开展动员。

我之所以对中国战胜疫情有信心，还因为看到了中国在抗击疫情中释放的强大能量。拥有 1100 多万常住人口的大城市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大量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进行体温检测；短短数天即在空地上建起拥有千余张床位的医院；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驰援湖北；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全力保障抗击疫情期间物资供应；中国科学家与全球医学和流行病学专家合作，快速完成对病毒基因组测序，并与各国共享数据……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强调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发布疫情最新情况，回应境内外关切，这一点非常关键。其间，中国政府每天都举行新闻发布会，精确发布相关病例统计数据。不断自我完善始终是中国治理体系的一大特点。通过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国将及时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信息收集反馈和决策纠错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疫情得到控制之时，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将很快恢复活力。只要回顾当代中国发展历程，就能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和韧性，这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基础。即使不是专业经济学家，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当前被暂时抑制的需求重新释放时，将推动中国经济出现“反弹式”或“补偿式”增长。

未来，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视为世界范围内遏制新疾病暴发和阻止其传播的一个转折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交流便利化，相应努力正变得至关重要。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在这方面开展了全新探索，历史很可能为此感谢中国。

（作者为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





## 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进步发展至关重要(风从东方来 ——国际人士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 发展中国家的光辉榜样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大约 30 年前，我第一次受邀来到中国，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提供建议。从抵达的那一刻起，我就被这个国家深深迷住了。中国人充满热情，他们渴望学习，努力改善生活。我当时就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很快就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我当时没有想到，中国会对我个人也如此重要。

能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是一件让我非常自豪的事情。我有幸访问过中国 60 多座城市：杭州、广州、哈尔滨、上海、兰州、青岛、昆明、天津、成都……也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体会。那些教会我理解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历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官员、学者、科学家、企业高管，也有农民、工人、士兵、普通上班族和学生。

2006 年，我有幸见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他当时引用盲人摸象的典故，告诉我看待中国不能只有单一的视角。他说，分析中国需要用横向视角把握不同地区，也需要用纵向视角把握整个发展历程。今天，当我对人讲述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时，就尝试将这两种视角相结合。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我一直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 40 年后中国还需要改革开放；第二，中国将在哪些领域继续深化改革。在我看来，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奇迹，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棘手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中国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追求发展质量上的提高。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从贸易、金融到外交、国防，从科技、创新到文化、体育，中国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近些年来，我一直做客全球各大媒体，就中国时政发表看法。我很荣幸能够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作出贡献。这种沟通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举例来说，自 2017 年中共十九大至 2018 年两会之间，仅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我就接受了足足 24 次有关中国主题的采访。

有人问我，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没有什么是依旧不变的？我回答，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曾经有人说，中国的发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爱国主义驱动的。几年前的一个深夜，在北京结束一场会议后，朋友问我什么时候休假，我回答：“这就是我的假期！”我想说的是，我被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所激励，从事同中国相关的工作让我充满激情。

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但我却想说，这只是第二位的变化。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第一位的变化是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100 年甚至 1000 年之后，当未来的史学家回溯过去，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惊人成就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转型之一。展望未来，中国的成功转型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光辉榜样，也将对全世界的进步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本报驻美国记者郑琪采访整理）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1/22/nw.D110000renmrb\\_20181122\\_1-23.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1/22/nw.D110000renmrb_20181122_1-23.htm)



# 生动的故事 非凡的成就

## ——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在海外引起热烈反响

由美国探索频道出品、英国子午线制作公司承制的电视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英文名为《China: Time of Xi》)10月16日完成首播。这是国际主流媒体首次播出系统解读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的节目。

节目由探索亚太电视网副总裁魏克然和英国资深电视制作人丽兹·麦克劳德担任监制,通过采访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对世界的启示。

从精准扶贫、医改、教育、高铁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故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环境治理等领域的案例,再到“一带一路”建设、蒙内铁路、中欧班列……这部三集纪录片讲述的一个个生动故事,让人思考中国为何能取得今日的成就,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 感知历史性变革

10月14日是印度最大的节日——排灯节,而印度电视台首席记者贾竟是在第一时间观看了《中国：习近平时代》。他曾到中国参与报道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和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杭州和厦门的干净整洁、中国政府的强大治理能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喜欢中国,对中国的发展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在第一时间观看了这部电视纪录片,里面有很多我熟悉的画面。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过去5年在国内外都取得非凡成就,让我非常感慨。”

看到纪录片中习主席在梁家河与农民在一起的镜头,贾想起了自己在中国采

访到的脱贫民众幸福的笑脸;看到片中各种高技术,贾回忆起在中国看到和体验过的高铁、共享单车以及引入印度的二维码支付等。“短短5年时间,习近平主席让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用‘习近平时代’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十九大后中国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胡逸山曾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政治秘书,现在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10月16日,他刚刚结束在北京的学术访问回到吉隆坡。他经常访问中国,纪录片中展现的高铁建设成就颇能引起他的共鸣——“高铁是我在中国不同城市间旅行的首要选择。发展高铁拉近了中国城市之间的距离,还形成了不少‘1小时生活圈’,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谈及中国近5年来的变化,胡逸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最大变化是经济建设从重‘量’转向重‘质’,即从生产型经济逐步过渡为服务型经济。”他也为中国科技创新环境的极大改善以及在环境治理方面作出的努力点赞——“中国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新能源开发方面,都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中国业务总监贾韦德·阿赫塔尔近日前往中国参加了“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对今日中国之发展成就深有感触。他说,中国的发展成就就是全方位和立体的,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思想为中国发展明确了方向。在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步伐走得更稳更实。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等针对性政策,中国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大批贫困人口脱贫问题。“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韩国檀国大学教授金珍镐认为,纪录片客观生动地讲述了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一系列感人故事。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脚踏实地处理国内外大事,成就突出。金珍镐告诉本报记者,这部纪录片里最让他感动的是,习近平主席对百姓的关爱——尊重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他由衷表示:“有这样的领导人,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

### 唤起记忆和憧憬

纪录片的一幕幕场景,引起观众对过往的回忆,对未来的憧憬。

澳中友好协会副主席简·埃弗雷特清楚地记得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时的情景:“当时我就站在欢迎的队伍中,可惜与习主席距离太远,没有机会交流。”习近平主席对澳大利亚、特别是对塔斯马尼亚州的访问对当地而言意义重大——全世界一下子都注意到了这个处在天涯海角的岛屿。“习主席的访问使塔斯马尼亚重新出现在世界地图上。”埃弗雷特激动地说。

“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习近平主席会见塔斯马尼亚州斯科奇一欧克伯恩学校师生,并邀请他们访华。校长穆勒说,从此以后,学校

的知名度急速攀升,“我们与北京的景山学校结为姊妹学校,认识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朋友,获得了很多此前从未有过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与习主席的会见大大增强了孩子们的自信心,使他们的眼界超越了塔斯马尼亚岛,大大拓展了孩子们的国际视野”。

在胡逸山看来,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近年来的最大成就之一,也是中国大国责任担当的体现。他说:“‘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是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带动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金珍镐说,很多韩国人认为,现在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有能力走近国际舞台中央,这与中国过去5年来取得的建设成就密不可分。“中国应势而为、勇于担当,让我们感受到同为东方人的骄傲。作为韩国人,我们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下,中国梦联通亚洲梦,实现亚洲的共同发展”。

旅居美国20多年的柳奇是美国华盛顿陕西商会会长,他表示:“我每次回国都能感受到祖国的高速发展。一个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海外华人的可靠依托和支撑,我们为有这样的祖国备感幸福和自豪。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给我们海外侨胞莫大的信心和力量。我们都坚信,在习主席的带领下,祖国会繁荣昌盛、再创辉煌。”

(本报北京、新德里、曼谷、伊斯兰堡、首尔、堪培拉、华盛顿10月16日电 记者王新萍、倪涛、苑基荣、俞懿春、徐伟、陈尚文、李锋、高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拉开帷幕。5年一次的盛会,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瞩目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解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热词。研究中国的外国专家们表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将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方针和政策,是世界倾听中国故事、学习中国经验的一次重要契机。

### 新愿景令人向往

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说,世界都很关注中共十九大,期待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多极化格局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不仅注重本国发展,而且也为解决世界性难题贡献方案。我希望未来的中国继续将自身发展成就惠及更多国家人民”。

“中共十九大是中国和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对美中关系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杜大伟希望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新动力,这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也能为美国公司带来新机会。

“十九大是中国最重要政治事件之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人民的检验,大会将发布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愿景,这对于中国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巴基斯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菲扎尔·拉赫曼认为,十九大将一如既往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越南《中国研究》杂志原总编辑、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杜进森曾于今年9月赴广西参加第十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华期间,他深切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中共十九大的热切期盼。杜进森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希望与重托。“中国人民对十九大的关注度越高,越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紧密联系”。

“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源自始终坚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国家和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任务,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阿赫梅特别科夫指出,十九大承载着众多历史使命,比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设计清晰明确的路线方针等,他相信本次大会一定能为中国未来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指明方向,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优秀答卷。

“非洲人和南非人非常关注中共十九大,期望继续前行的中国经济与繁荣给非洲经济带来前景与机遇。非洲期望十九大能进一步推进非中友谊和合作。”南非金山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加斯·谢尔顿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全球领先的工业制造国与出口国。中国经济奇迹让非洲人感到惊叹和向往。

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列梅加告诉记者,他会认真研究中国面向未来的发展纲领,从中吸收经验,为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友好往来,在很多领域展开交流与合作。法共《人道报》社长勒亚里克称,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衷心祝愿十九大圆满召开,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升级、进一步消除贫困做出更加有力的布局。中国经验值得法国学习,法共也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党之间的交流”。

### 铸伟业执政有方

短短几十年,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奋进的中国更以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外国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创造中国奇迹最核心的密码。

在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看来,过去5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增长,治理污染力度不断增强,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制度不断改善,均得益于中国领导人的开明和正确的领导。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方。”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核心“秘诀”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理解人民真正的需求,时刻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以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进而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中国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经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兹利表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10%以上的惊人速度,如今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领导人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策

——外国人士热议中共十九大

瞩目中国道路 看好中国前景

## 国际论坛

# 共产党领导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世界要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是最适合中国发展的选择

当前,西方的分析家和媒体都聚焦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希望能从中找到中国未来发展的线索。

在过去5年里,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西方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包括:是什么促使中国共产党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政策、组织和管理、愿景和挑战是什么,习近平在加强党对经济和社会的领导方面提出了哪些创新举措,为什么习近平将“从严治党”提高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行动这么坚决等。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了解一些更加

基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将中国带向举世瞩目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时代变化,做到与时俱进;如何从党的历史、成绩和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作为一个长期执政党如何实现自我监督;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怎样的挑战等。

中国有着十分特殊的国情,面临着增长放缓、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等复杂的国内压力,以及全球经济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恐怖主义、地缘争端等严峻的国际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来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得到了公众的大力支持,一系列根除腐败、打击浪费的行为改变了政府、国企领导者的工作方式,甚至是思考方式。

一些外国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反腐行动作出误读,这暴露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

很浅薄而且是单一维度。鉴于国家的体量和复杂程度,中国领导人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有着多方面考量。就中共加强从严治党 and 反腐力度而言,我认为主要有10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腐败官员得到法律应有的惩处,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和司法公正;第二,加强纪律能够增加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使人们对党的领导更有信心;第三,打击腐败让共产党的执政更加高效,使党的决定能更好地惠及大众,不被个人利益所扭曲;第四,腐败会造成市场扭曲,减少腐败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第五,腐败官员会阻碍经济改革,因为改革常常威胁到他们的私利,撤掉腐败官员将有利于推动改革;第六,腐败官员常常因个人利益而无视法律法规,起诉他们能够强化法治,符合国家利益;第七,一些腐败官员除了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庫恩：

# 反腐風暴重塑中共黨內信心



■庫恩曾撰文指出，讀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有助於更好預見中國的未來。 資料圖片

「中國通」系列訪談

之中國道路

美國學者羅伯特·庫恩是一位海內外知名的「中國通」，到中國已近三十年，撰述中國，聲名遠播。他給自己的定位是，「用中立的態度向西方介紹真實的中國」。過去五年來，中國的變化令他印象深刻。庫恩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稱，反腐風暴贏得了民眾支持，重塑了中共黨內信心，加強了國家政治穩定；中國現在需要應對多重挑戰，需要習近平這樣的領導「核心」；中國政府正在直面和解決經濟存在的問題，他對中國經濟未來審慎樂觀，相信中國有望改造成一個世界級的良好營商環境的國家。庫恩向記者表示，「了解中國是一個偉大的禮物，幫助中國向世界傳達的真實故事，是我對中國表達謝意的方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近年來中央八項規定的實施，讓不善飲酒的庫恩非常高興：「以前與中國官員打交道，我經常因為不喝酒而感到難堪。現在好了，在新的規定下，我再也不必為不喝酒而感到壓力了。」

貪官落馬有助政治穩定

「西方媒體要求我解釋反腐唯一目的是壓制政治對手，中國媒體則要我解釋反腐唯一目的是懲罰腐敗官員，但我對中西方媒體的回答都是一樣的。」庫恩說道。

他指出，部分外媒將中國反腐看成政治工具，這是對中國的一種表面和一維的認識。他說，一些腐敗官員有政治野心，可能會破壞制度的穩定，他們的落馬有助於維護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這對中國至關重要。

在庫恩看來，中共所有重要決策，都適應了國家的規模和複雜性。一方面，反腐維護了法律和司法公正，腐敗的官員一定要被繩之以法；通過打擊腐敗，提升了民眾對執政黨的信任，有利社會的穩定；打破利益集團，推進了中國的改革。

打貪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另一方面，反腐使社會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任何腐敗都不符合市場規律。有些人說，中國社會需要腐敗來辦事，但我並不認同。腐敗官員阻礙了改革和法治，因為這兩者都威脅到他們的私利。」

在他看來，中國大力反腐對外企也是個利好，中國要成為世界商業中心，必須有世界一流的商業道德和標準。腐敗曾經是外企在華經營的最大擔憂之一。他們曾擔心被迫參與賄賂，或不行賄賂會讓生意失敗，如今這種擔憂大大減少。

通過反腐，中國有望改造成一個世界級的良好營商環境的國家，庫恩對此抱有期待，「在本世紀中，中國的GDP可能是世界第一，但無論經濟體量有多大，如果腐敗叢生，中國將不會實現自己偉大的目標。」

十九大後反腐定將繼續

庫恩相信，中共的反腐行動得到了民眾廣泛的支持，一定會在十九大後繼續下去。談及未來反腐，他認為，「在一黨長期執政的制度下，如何長期維護廉潔的政府，這對執政黨來說是個挑戰。關鍵在於，中共內部的制衡和紀律的制度化。我很同意中共將反腐制度化，而不是寄希望於一兩個人，監察委員會未來如何運作，非常值得關注。」

當然，「不可能指望中國社會一夜之間就發生變化，這需要一個過程，也許10年、20年，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位「中國通」補充道。



■庫恩指中國反腐風暴贏得了民眾支持，重塑了中共黨內信心。圖為學生在河北石家莊橋西區檢察院職務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參觀。 資料圖片

羅伯特·庫恩 投資銀行家變身「中國通」

羅伯特·庫恩是著名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近期，他與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主持合作了節目《走近中國》。他編輯撰寫了《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中國三十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中國領導者是如何思考的》等25部著作。庫恩也是美國《世界經理人》雜誌和《環球人物》雜誌的特約撰稿人，美國CNBC和彭博電視網的特約評論員。同時，他還是國際企業戰略家和投資銀行家、庫恩基金會董事長，資助了中國的金融、媒體、科學和教育項目，促進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庫恩基金會出品了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系列節目《走近真實》（Closer To Truth），探索最新科學進展的意義與蘊涵。

憶習近平用「盲人摸象」提示：客觀認知 縱橫了解

特稿

2006年3月，庫恩在友人的介紹下與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有了一面之緣。讓他印象最深的是，習近平用「盲人摸象」這個成語來比喻外人看中國不同地區發展的局限。「這樣的比喻是新穎而有用的。」

「習近平建議我，要全面了解中國，就要跨地區橫向了解，也要縱向了解中國的

上下五千年。我現在依然記得這個說法。」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勿以單一維度看中國

庫恩引述習近平稱，「外國人往往以單一方式或維度來看待中國，但國家太複雜了。例如大象的背部，相當於中國的西部，很大，卻還沒有開發；象腿，相當於沿海城市，發展

得有力。他稱，外國人很難看破真相，因為他們無法看到整個大象。」

「中國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習近平建議庫恩通過地理「橫向」和歷史「垂直」脈絡來寫書，他告訴庫恩，「中國遭受了一個多世紀的壓迫和屈辱。中國的發展至少部分是由愛國主義和自豪感驅動的。」

「習核心」領導 助應對多重挑戰

■庫恩主持中國國際電視台節目《走近中國》，圖為他採訪今年初舉行的全國兩會。 網上圖片



「四個全面戰略」，「五大發展理念」……庫恩對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相關表述非常熟悉，他認為，中國現在需要習近平這樣的核心。

反腐及革新制度顯勇氣

他分析道，中國現在面臨多重挑戰。在國內，中國需要應對深化反腐、全面改革、經濟放緩、產能過剩、生態污染等問題；在國際上，中國需要應對地區衝

突、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等問題。他稱，中國需要強有力的領導應對當前前所未有的複雜挑戰，「習核心」是時代使然，眾望所歸。

庫恩稱，中國當前必須深化改革，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需要克服利益集團的阻力。「沒有人能假設反腐沒有風險，習近平在剷除腐敗和革新制度方面表現出了勇氣。」

通過核心加強中央權威

作為核心，習近平從嚴治黨，使黨員和社會更加自信，反腐正在改變政府官員工作方式和社會風氣。

同時，庫恩認為，以習近平為核心，並沒有改變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中共鼓勵民主，徵求黨員、基層官員、公眾的意見，並通過習近平的核心領導加強中央權威。

華官員近年更直面問題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的過程中，庫恩深諳中國政治語彙，信手拈來。用他的話，給自己的定位是，「用中立的態度向西方介紹真實的中國」。過去五年中，庫恩的觸覺對中國更為深入，與央視創辦了節目《走近中國》，採訪了大量中國政要、企業家、學者。

每年，庫恩都要訪問中國六七次，每次行程在3個星期左右，有時更長。「我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中國。如果有一段時間不來，我就會擔心自己對中國有隔膜了。」庫恩笑說。

他發現，最近幾年中國官員企業家們更直面問題。「他們此前只會說政府高度重視環保，如今開誠佈公地承認污染，這確實是非常大的進步。」

外媒開始承認中國地位

在過去五年中，庫恩注意到，外國媒體和專家也發生了明顯的轉變。西方媒體開始明確承認了中國在經濟上、外交和軍事上的國際地位。這包括對中國企業的尊重，對中國科技創新的欣賞，對市場競爭的擔憂。在西方媒體報道中，中國社會的另一個進步是，絕對禁止將死刑犯作為移植器官的來源。

在閒暇時間，他酷愛乒乓球，並得到了中國一位乒乓球教練的指導，時常和中國官員切磋技藝，乒乓球也打得越來越棒。庫恩告訴記者，他的中文也在不斷進步。

「了解中國是一個偉大的禮物，幫助中國向世界傳達的真實故事，是我對中國表達謝意的方式。」庫恩說。

經濟「新常態」重綜合指標

中國經濟現在已經進入「新常態」。「顯然，我們需要GDP增長率，但不應強加過分的意義。」庫恩認為，評估中國經濟「新常態」已經不能僅僅看GDP，也要看到創新和研發支出佔比、中國自由貿易區的數據（如負面清單縮減）、非政府組織關於中國環保的報告、城鄉失衡減少，堅尼系數下降等等指標。

中國現在認識到市場必須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但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如各省市發展同質化的行業競爭。此外，如何縮小不同地區差異，如何重新平衡城鄉差距，也是挑戰。

清理金融體系促持續增長

庫恩認為，世界經濟福祉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據庫恩觀察，外國經濟學家的擔心來自中國債務的增長。一方面，企業債務正達到難以控制的水平。另一方面，政府的不良貸款率可能並沒有中國報告得那麼樂觀。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國不斷增加的債務將使中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緊張。



■中國電子商務和服務行業有了實質性的增長。圖為民眾在使用手機支付。 中新社

庫恩說，經濟進步的一個積極指標是，中國官方正式報道不良貸款率的增加，這意味着政府準備清理金融體系，這是可持續增長的關鍵。

他認為，目前中國的消費品，電子商務和服務行業已經有了實質性的增長。所以雖然短期前景不明朗，但長期的繁榮一定是建立在經濟轉型基礎之上的。他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持樂觀態度。





往期回顾

分类检索

## “一带一路”将成本世纪伟大故事

### ——专访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本报驻美国记者 张朋辉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5月08日 第01版）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前夕，本报记者专访了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作为此次高峰论坛的嘉宾之一，库恩博士密切关注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对“一带一路”建设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抱有很高期待。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正当其时，“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故事之一。

#### 中国找到了同世界的契合点

库恩分析说，“一带一路”在世界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中国找到了自身发展经验同世界需要的契合点。他说，“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许多国家受到热烈欢迎，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基础设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关注点。二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他们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刺激经济增长。三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既是一个榜样，也是能够带来专长、经验和资本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是与中国加强合作的理想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成果超出预期，得到国际社会积极评价。库恩说：“习近平主席关于合作共赢的全球化观念，从蓝图变成了路线图，从计划到付诸实践，从纸面的概念变成了地面的项目。过去3年，‘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遍地开花，我亲自见证了这一设想从愿景变成现实。”库恩说，他更看重的成就是将正在进行的“最



# 美专家：习式外交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

2015-09-10 22:07:27

新华国际 骆珺 - 普通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认为，习近平主席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性的外交方式更有可能使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巨大成功”。

库恩是《江泽民传》和《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两本书的作者。他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回忆起习近平此前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加利福尼亚州的访问和担任国家副主席时对艾奥瓦州的访问，认为这些访问展示了“中国最好的形象”。



(图为2015年5月29日，库恩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研讨推介会上发言)

# 罗伯特·库恩谈中国扶贫：21世纪最伟大的世界故事之一

2019年10月17日 10:43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10月17日电（郑琪 黄钰）

2019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六个国家扶贫日，也是国际消除贫困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2013至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至1.7%。联合国2015《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减贫方面贡献超过70%。

近日，由中美团队联合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加州电视台播出。该纪录片的主持人和撰稿人、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获得者罗伯特·库恩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评价中国扶贫工作为“21世纪最伟大的世界故事之一”。

## “遇到的每一个贫困家庭都让我感动”

1990年，罗伯特·库恩博士以投资银行家的身份首次到访中国。“我一到中国就被迷住了，中国人民有一种新鲜的热情，他们渴望学习，想要改善生活……”当时的库恩还不知道，中国人民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后会将他紧紧系在这片热土上。



## 通讯：罗伯特·库恩——“无心插柳”的当代中国讲述者

2019年01月28日 11:03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

Play Video

视频：专访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无心插柳”的当代中国讲述者来源：中国新闻网

(改革人物志)通讯：罗伯特·库恩——“无心插柳”的当代中国讲述者

中新社纽约1月27日电 题：罗伯特·库恩——“无心插柳”的当代中国讲述者

中新社记者 马德林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75岁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酷爱打乒乓球。30年前他首次到访中国时，就曾为打乒乓球“逃”掉了中方为他们安排的京剧演出。



资料图：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89年，在科技和投资领域已颇具建树的库恩受邀来华，为中国科研机构融入市场经济提供建议。“我第一次到中国时，中方安排了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朱亚当陪同我，并做一些翻译工作。”库恩近日在纽约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回忆起这段有趣的经历。他告诉记者，有一天中方安排美国客人观看京剧表演。“但我告诉朱亚当我不想看京

剧，我想去打乒乓球。”库恩回忆道，“他一开始坚决不同意，说我必须按照安排去看京剧。”

“于是我对他说：‘发展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就是要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并承担一点风险。所以你何不承担一点风险，满足一下我打乒乓球的愿望呢？’”库恩说，朱亚当考虑之后真的帮助他实现了愿望。“他用一辆小汽车把我带到人民大学，还找来了三位专业球员、一位教练及一些学生和我一起打球。那天我们玩得非常高兴。”库恩告诉记者，他们两人的友谊保持至今，并且成为了合作伙伴。

“我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勇气和眼光：他愿意冒着违反规定的风险，帮助我实现打球的愿望。”库恩说，当时中国给自己的第一印象，是从这个年轻人和其他许多中国人身上感受到的一种朝气，“那是一种纯真的热情，他们渴望发展经济、渴望学习、渴望参与到世界当中。”

这次中国之行，也改变了库恩之后的人生轨迹。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被誉为“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但他对记者坦言，自己最初从未计划过要将“讲述中国”作为一项事业。首次访华之后，库恩的确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1990年代初又多次前往中国学习，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当时只是很享受学习的过程，我根本想不到中国在几十年后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说，当自己回到美国同朋友谈起中国的变化时，“没人相信我，他们还认为中国停留在文革的年代。这让我感到沮丧。”

1997年底，库恩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资本浪潮》的拍摄。这套节目播出后取得良好反响，他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研究中国的一位专家。“之后类似的项目接踵而来，我最终也确实成为了一个‘中国通’。”库恩说，“但我真的从未计划过这些，这一切的起源纯粹是因为我喜欢研究中国的方方面面而已。”

库恩于2000年出售了自己在美国的企业，开始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参与制作中国主题的纪录片等方式，向世界讲述他眼中真实的中国。如今，他每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度过，“我每年要去中国6、7次，每次差不多3周时间。”库恩告诉记者。

谈到自己获得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库恩称自己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获颁奖章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但我认为这并不单纯是对我个人的奖励。”他对记者表示，这枚奖章也是中国对国际传播的一种肯定，显示出官方对“客观、全面、真实地讲述中国”的重视。

在库恩看来，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改革开放不仅令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也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益处。库恩强调，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综合国力的巨大提高，中国也需要适应自己在国际社会中位置的变化，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不仅事关中国人民自身的福祉，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世界的未来发展。”（完）





新华社客户端  
新主流·新体验

立即体验

## 专访|美国不应强迫中国做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事 ——访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



华国际 - 2019-06-04 17:08:38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的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库恩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美国不应强迫中国做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事，不应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协议”，而应尊重中国按照实际情况，做既符合本国利益又充分考虑对方诉求的事。

库恩批评美国不断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做法。他表示，关税首先损害的是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利益，更无益于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创造新就业岗位。

“全球化让世界经济变得更有效率，中国是这个体系的一环。就算不进口中国产品，工作岗位也会流向墨西哥、越南、孟加拉国等国，而不会回到美国。”库恩说。

他说：“美国要理解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美国）不要试图限制这种模式，要看到中国在解决各种问题方面的努力。比如自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推进国内政策的合规性改革。对中国来说，更快、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进一步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长期来看对中国消费者也是好事。”



这是库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宿亮摄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库恩说，美国应认识到中国正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间，知识产权保护受到中国各级政府关切，情况大为改观。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已经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现在在中国，使用别人的知识产权要支付高昂费用，而且一旦违规将受到严惩。”

在谈到中方日前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时，库恩表示，白皮书传递出一个最清晰的信号，即中国寻求并且期待与美方的经贸磋商取得成功。

“在我看来，发布白皮书是在为真诚磋商铺平道路，”库恩说，“白皮书明确表明，中方强调协调、合作、稳定和共赢是唯一道路，应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化解分歧、解决争端。”

库恩认为，要解决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应摒弃偏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动机和诉求，尊重对方国情，寻求利益共同点，从而做出正确决定。

他表示，在美国有许多人是乐见中美两国合作而非走向对抗的，因为中国在维护世界稳定与繁荣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库恩说：“（中美关系）脱钩不仅严重损害两国利益，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巨大灾难，可能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来摆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些损失甚至无法挽回。”（记者：曹筱凡、史霄萌；摄像、剪辑：宿亮；编辑：沈浩洋）

<http://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6182178?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 共和国的朋友 |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 扭转西方误解 讲述“真实中国”



央视新闻 2019-08-10 03:24

朋友的本质是了解与沟通。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位“共和国的朋友”，他的自我定位是：一位理性的沟通者。在他看来，真正的朋友并不是一味讲你爱听的话，而是告诉你真相。他有很多身份，企业家、作家、主持人，但在过去十多年间，他把讲述一个当代中国的真实故事作为主要任务，力图在中西两种文明之间架设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他就是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

这位一身运动服、打得一手好球的老者就是罗伯特·库恩。库恩酷爱打乒乓球，这个爱好正是 30 年前，他首次到访中国时培养出来的。当时，已是美国知名神经科学家和投资银行家的库恩受邀来华指导科研机构融入市场经济，那时的他学打乒乓球其实“另有目的”。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打乒乓球帮助我了解中国，因为在乒乓球俱乐部打球可以遇见来自中国的各界人士，我们会进行坦诚的交流。

这次中国之行改变了库恩的人生轨迹，他强烈感觉到中国会对未来世界至关重要。从此，他开始频繁来到中国，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他逐渐意识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与他所见到的中国严重脱节。一个新的想法也随之萌生。

# 美国专家库恩评香港局势： 暴力和骚乱是“人民的敌人”

来源：中国日报网 - 2019-08-13 18:50

**导读：**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长期关注中国问题；近来，不断升级的港独行径和日益恶化的香港局势让他忧心忡忡。

在向中国日报旗下传播型智库中国观察撰文时，他指出，香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归于五个方面的原因；北京将尽可能多，尽可能长久地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一国两制”。但是，有三条红线不能跨越；中央政府为确保三条红线会进行最低程度的必要干预。但在任何情况下，如有越线行为，中央政府都会做出反应。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Robert Lawrence Kuhn)是专题纪录片“来自前线的声音：  
中国的扶贫之战”的主持人兼作者；  
2018年12月，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 罗伯特·库恩：“中国奇迹”得益于这五大因素

2019年10月03日 07:05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库恩近日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说，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程，除了经济成功，还有两个历史性转变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是从封闭到开放，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一个是从贫穷到富裕，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而中国奇迹的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人民的勤劳苦干和着眼长远的政策与目标等因素。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李睿 摄）

“提到新中国 70 年的成就，人们一般都会聚焦它成功的经济转型，而它的转型不止在经济领域。”库恩说。他指出，今天的中国，从贸易、金融到外交、国防，从科技、创新到文化、体育，一举一动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新中国一直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逐渐成为世界稳定、平等和繁荣的捍卫者，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他说，中国的成功转型对全世界的进步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库恩指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带去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技术、投资和发展机遇”，同时在世界维和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等关乎全球福祉的国际事务中“表现出强大领导力和坚定支持”。

库恩认为，中国还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往往被外界所忽视，那就是“中国是迄今为止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当未来的史学家回望历史，中国的发展成就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型之一。”他说。

深为中国扶贫努力而感动的库恩亲自担纲主持人和撰稿人，与中美摄制团队历时两年联合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今年 7 月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加州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了此片。

“制作这部纪录片并不容易，我们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一次拍摄几周，其间我都病了两次，可以想见扶贫工作的开展有多么不易。”库恩说。



▲资料图：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摆起长龙宴欢庆苗年（2019 年 1 月 17 日摄）。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不仅成功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还成为小康示范村。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库恩认为，中国经济奇迹与扶贫事业的“史无前例的成功”，有五大关键因素。

首先，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正确决策有着直接关系，“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充分调动经济和市场活力，中国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人民的勤劳苦干，他们拥护和支持政府政策，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国家命运而长期努力，也是关键因素。”库恩说。

再则，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目标都着眼长远，一般都有长期、中期和短期目标，并不断根据形势调整和修改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措施。

库恩表示，中国奇迹发生的另外两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政府在实施和推广一个项目或一项政策之前都会进行小规模试验和测试，总结经验教训优化之后才会在全国推广；一些项目和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则会及时承认，并及时调整和修正，“这些方式方法都值得鼓励”。

1989年1月首次受邀访华时，库恩的身份是投资银行家，并拥有大脑解剖学博士学位。“我从第一次来中国，就迷上了这个国家，中国给了我全新的感受，中国人热情好学，并坚定要提高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他说。

作为一名“中国通”，75岁的库恩还在坚持学用普通话。迄今他至少200多次飞赴中国出差、调研，通过出版书籍和制作纪录片等，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一个全面、真实的当代中国。（本文由杨士龙采写）

<https://news.sina.com.cn/c/2019-10-03/doc-iicezueu9791174.shtml>



**CNN**

# **Wuhan Coronavirus – Dr. Li Wenjiang**

**Robert Lawrence Kuhn, February 7, 2020**







# **CNBC – Closing Bell**

## **Coronavirus – China's Mobilization**

**Robert Lawrence Kuhn, February 19, 2020**



<https://www.cnbc.com/video/2020/02/19/how-companies-are-dealing-with-coronavirus-impact.html>



**CNN – CNN Newsroom**  
**7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PRC**  
**Accomplishments and Challenges**  
**Robert Lawrence Kuhn, October 1, 2019**







## Interview: Renowned observer highlights two "historic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s 70-year development

Source: Xinhua | 2019-10-01 09:56:49 | Editor: Xiaoxia

NEW YORK, Sept. 30 (Xinhua) -- China has made two "equally important historic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ast 70 years alongside its remark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aid a leading U.S. expert on the Asian country.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are China's "pro-active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community and its "remarkable succes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hairman of the Kuhn Foundation Robert Kuhn told Xinhua in a recent interview.

"What is especially striking is the scope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s," said Kuhn, who has visited China for over 200 times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was awarded China Reform Friendship Medal in December 2018.

"There was a time when China was a closed society, eschewing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he said. "Today, China is a champ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a bulwark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through global governance."

What China exports are infrastructure expertise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vi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upport for the global commons through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leadership on climate efforts, he said.

"There was also a time when a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the world's abject poor were living in China," said Kuhn. "China has brought over 750 million



# **CNN – Quest Means Business**

## **US Tariffs, Trade Negotiations, Hong Kong**

### **Robert Lawrence Kuhn, June 14, 2019**





# BBC – World News

Hong Kong Protests, China Importance

Robert Lawrence Kuhn, July 27, 2019





# CNN – Today

## Hong Kong Protests, China Meaning

Robert Lawrence Kuhn, August 12, 2019





# BBC – World News

Hong Kong Protests, China Response

Robert Lawrence Kuhn, August 18, 2019



**BBC** WORLD NEWS

WORLD NEWS TODAY

**Hong Kong protests**

Protests were sparked by a China extradition bill



CONTACT US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opinions on this page? Write to us at [letters@scmp.com](mailto:letters@scmp.com)  
If you have an idea for an opinion article, email it to [oped@scmp.com](mailto:oped@scmp.com)

# INSIGHT

## Power with purpose

Robert Lawrence Kuhn explains why abolishing presidential term limits may well be good for China

To interview delegates and officials at the annual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interspersed with being interview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bout China abolishing term limits for its president, is to inhabit parallel universes.

Delegates and officials focus on clusters of issues from controlling financial risk and reducing pollution to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timulation, plus enhancing and institutionalising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ith a powerful Nation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no surprise, focus on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ending term limits, assum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now serve in a for-life dictatorship, reminiscent of Mao’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the Kim family in North Korea and some African countries.

It is no challenge to explain why abolishing term limits is bad for China – dependency on one human being who is not omniscient but is hostage to fortune, fewer and weaker checks and balances, forced conformity in a complex society with no easy answers, etc. The system begins stronger in that hard choices can be made and consistency maintained, but it could become brittle in that officials are more wary and may say things they do not believe.

It is a challenge to explain why abolishing term limits is good for China, so that’s what I will do.

First, some background. There are three separate issues being confl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ending term limits, the 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ough terminating the two-term limit for China’s presidency captures headlines, it is more the symbolic, final step ratifying Xi’s near-absolute power than the big breakthrough itself.

Xi’s prior designation as “co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October 2016 and the inscribing of “Xi Jinping Thought...” in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in October 2017 were more meaningful.

Moreover,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highest authoritative body in China, unambiguously supports Xi. China watchers see the front page of *People’s Daily* – published the day after the new Standing Committee marched out on stage – which featured Xi’s photo on top, many times larger than the smaller, subservient photo of all seven members lined up on the bottom.

All this reconfirms that, in a system where the party controls the state – especially where the party is Marxist and ideology is its basis for being – Xi, as core of the party, with his name inscribed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party and state as the contemporary arbiter of Marxism, will be the uncontested, overarching leader of China for the rest of his sentient life.

For 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official line is that the purpose is national cohesion brought about when the three top leadership positions –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 are aligned temporally and held by a single person.

This makes sense, but as a primary, proximal motivation, it is not entirely persuasive. The current structure has existed for decades without outcry or angst (not to mention that the three positions could be unified by installing term limits on the other two).

The “newera”, marked by economic, social and global complexities, is said to require firm and consistent leadership, making moot inner party struggles and even mitigating political gossip, facilitating focus on the tasks of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because advancing

reform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with entrenched interest groups resisting change, the message must now go forth that all must get with the programme, because you can’t outwit or outwait Xi.

Because, it is said that only Xi has the vision, experience, competence and character to bring abou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from 2020 to 2035 and ultimately to 2050 – bringing China to global centre stage – Xi’s unimpeded leadership is deemed essential. China cannot afford “downtime” to accommodate a change of leadership, and after Xi’s success at the 19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came the time to make clear that he will call the shot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Some argue that doing away with term limits show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hinese system as it allows flexibility in matching leadership to requirements (though what national leader, when extending his reach, has not claimed “current requirements” as justification?).

The party-run *Global Times* stated that ending term limits does not mean China has reverted to president-for-life tenure. (But who can deny that however long Xi holds the top positions seems largely up to him?)

As for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almost unanimous, disparaging foreign reaction – other tha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 did not burnish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More worrisome would be a reluctance by officials to offer constructive opposing views on central policies.

By stressing term limits,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misses fundamental changes going on in China – this year, innovation,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facilitation of business (cutting bureaucracy and reducing taxes), rural revitalisation and rural land

reform.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hows how the grand vision and mission of the 19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is translated into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f one sees only term limits, one cannot visualise the big picture.

As for Xi maintaining the presidency perpetually, it doesn’t actually matter much – this is the deep insight of how China’s party-state system works. Xi as core of the party and “Xi Jinping Thought...” as the party’s (and now the state’s) guiding principle means that Xi can transfer titular party leadership and/or the presidency to others and still maintain his overarching power. It may well be that, after serving two or even three more terms, rather than trying to find and install another leader like himself, he will move to bring about true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Here’s the best case. Xi will not be leader-for-life, but leader long enough to bring about China’s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establish a Chinese kind of democratic norms. Could Xi continue until around 2035, when China plans to have “basically” achieved full modernisation, heading towards, by mid-century, 2050,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Many expect this experiment to end badly for China. It is indeed an experiment but its end is not set. It may be a race between achieving Xi’s grand vision and some untoward perturbation that could cause fracture.

All factors considered, I am not saying abolishing term limits is absolutely good for China. I am saying it may be good – because of China’s special conditions and Xi’s special capabilities – but if it is good, it’s just for this once, and it’s just for so long. That’s the best case. I’m rooting for Xi.

Robert Lawrence Kuhn is a public intellectual,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ategist and investment banker, and China expert/commentator. He is the author of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 Private clubs deserve ‘cushy’ rental deals

Edith Terry says private recreational clubs are part of Hong Kong’s heritage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nurturing less popular sports, as well as a unique hybrid culture

In 1964, a young German, fresh off the plane at his first job, went in search of a social group. He found a home away from home in Hong Kong’s oldest private recreational club, newly relocated from a prime location on Victoria Harbour, where City Hall is today, to a modest flagstone boathouse beneath Island Road on Hong Kong’s south side. Fifty-five years later, Frank Pfeiffer, a Zen Buddhist and mountain climber, is still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 established in 1849. He has watched it ring the changes from Hong Kong’s colonial society in the 1960s, when it had only two Chinese members and no female members, to the hybrid institution it is today, under its first Hong Kong Chinese chairman, Wu Kam Shing.

Its membership is a spectrum of Hong Kong’s diverse and athletically minded middle class. There is the Hong Kong Chinese core reporter who visits the club in Deep Water Bay every morning at 6am on her way from home in Ap Lei Chau to her workplace in Sha Tin. There are her fellow swimmers, many elderly, who swim out to the buoys, rain or shine, hot or cold, every day. Some 100-150 “paddlers” use the club as a base for outrigger canoeing, dragon boating and paddle boarding. Some of the sports were unknown to Hong Kong before the club nurtured them, others, like dragon boating, are deeply traditional.

In the current debate over the future of the 67 private recreational clubs that pay minimal rents to the government, history has been swept aside. True, they were designed on a colonial template, in which the diverse ethnic groups were given separate retreats. Membership at the pinnacle clubs was reserved primarily for the British. For other ethnic groups, there was a Chinese Recreation Club, a Club de Recreio, a Filipino Club, an Indian Recreation Club, and so on.

Hong Kong’s colonial rulers reviewed the lease system for the private clubs in 1968 and 1979, and in the run-up to the handover in 1997 when leases were restricted to 15-year terms. At the handover, a number of leases were extended to ensure a so-called smooth transition. The sceptic would argue that this was a dodge, and indeed, in 2011, during the first post-1997 review of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ost of the clubs seemed oblivious to public concerns as well as new requirements for “opening up”

## The government argued that subsidies were needed because use of land for sports and recreation would never trump commercial utilisation

to schools and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Following the last well-publicised review in 2013 and the current investigation seeking new venues for public housing, they are no longer complacent.

Should the private clubs have got their cushy rental deals in the first place? At the time of the reviews 50 years ago, the government argued that subsidies were needed because use of land for sports and recreation would never trump commercial utilisation. What was true then is even more so today. The high cost of land in Hong Kong is a drag on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existence of the private recreational clubs means it has been less of a drag on sports.

Most of the clubs with government leases are framed around core sports – golf, tennis, horse racing, swimming, sailing and rowing, to name a few. Hong Kong athletes whose development was supported by these clubs have gone to the Olympic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the 1940s, the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Hong Kong’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the Hong Kong Sports Federation.

Public pressure on the clubs to forge community ties and contribute to Hong Kong through “opening up” schemes is appropriate – but not the pressure to convert their land to high-rise estates. The loss is not only to the core sports they represent but also to their unique DNA,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Hong Kong – diverse, cosmopolitan and adventurous. If you want to look for a Hong Kong that is not just about money, one place to look is here.

Edith Terry is the honorary secretary of the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 She writes in a personal capacity



Stand-up paddlers participate in an event held at the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 Photo: Jonathan Wong

## What the Western belt and road sceptics are missing

Wenshan Jia says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whole world to benefit from China’s initiativ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original plan to carry out a new type of “collaborative globalisation” above and beyond US-led type. It was proposed five years ago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fter the tapering off of US-led globalisation in 2008.

Xi offered three principles: mutual consult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China has since then fully executed 101 agreements with 86 countries, and total investment in the 24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has amounted to US\$50 billion, resulting in 75 industrial and trade zones, and 200,000 jobs.

With its focus on infrastructure, the initiative is a model not onl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also industrialised on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where ageing infrastructure needs replacing. It also adapts to each local, national or regional condition, situation and need. It is proving very democratic, more so than the lopsided US-led globalisation that spurred a populist, isolationist backlash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China has done a proper job of explaining to the West what the initiative is and extended a sincere invitation to each

country to join. Many think tank scholars and major media outlets in the West have found it potentially lucrative and expressed relatively strong support.

Yet, instead of appreciating China’s efforts to both inherit the liberal agenda of globalisation and forge a new path for global development, many Western political elite, led by the US, have started a campaign to resist the initiative. From Australia to the US, and the UK to Germany, there are calls for the West to cut interactions with China to minimise or resist its so-called “sharp power”. The labels typically applied to China include “authoritarian” and “predatory”, citing Beijing for not upholding “freedom,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 rights”, the core values of the West.

T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initiative reveals not only a contradiction in the Western mind, but also the narrowing or even closing of minds.

Isn’t it beneficial to meet the goals of forging connectivity and cooperation, as articulated in Xi’s effort to enrich and expand the meaning of the “free world” by liberating humankind from geographical, finan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rriers? The world is no longer the West versus the

rest, as we already live in a world connected by the internet. The initiative seeks to make the world more interconnected for both the West and the rest,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Recently, the initiative has inspired and spawned a push for localisation, particularly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led by the so-called “Quad” of the US, India, Japan and Australia. Some Western media view it as a rival or alternativ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But I would argue that it can be part of China’s initiative as long as the three Chinese principles (mutual consultation,

## The anti-China smear campaign must be replaced by a discourse involving consul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re observed in the Quad strategy. The belt and road was created to be an all-inclusive platform, so Beijing has no need to fear localisation as long as such strategies do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 or disrupt its plan. It would be wise for the Quad and China to look for ways to collaborate.

Quad countries need not take an antagonistic stance towards China; the anti-China smear campaign must be replaced by a discourse involving consul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world has experienced more than enough damaging talk, not to mention wars.

The core principles of Xi’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must be always applied in China’s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strategies. If China is, as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Sigmar Gabriel told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in Februar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any sort of genuinely global, geostrategic concept”, then Western leaders should cultivate a genuinely global strategy in line with China’s vision, for the betterment of all humankind.

Wenshan Jia, PhD,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t Chapman University (California)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Core strength

**Robert Lawrence Kuhn** says those who see China’s designation of Xi Jinping as core leader to be a variation of strongman rule misunderst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a people navigating their way through huge challenges

When, at a recent party plenum, President Xi Jinping (習近平) was designated as “co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some Western media were quick to condemn the rise of a new “strongman”. While recogni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Xi as the core was correct, conjuring up visions of an emerging dictator was not.

I recalled my meeting with Xi years earlier, when he was still party secretary of Zhejiang (浙江) province. Even then he was criticising “empty talk” and advising, “We should never overestimate our accomplishments or indulge ourselves in our achievements”.

I took note of how Xi stressed, “We need to assess ourselves objectively”. Hardly, in retrospect, the ruminations of a gestating dictator.

To understand why Xi is now the core, one must appreciate the complex challenges of our times. China is now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domestically – slow growth,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endemic pollution, imbalanced development, income disparity, social injustice, social service demands; and, internationally – wars, regional conflicts, sluggish economies, volatile markets, trade protectionism, ethnic clashes, terrorism, geopolitical rivalrie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Most critically, because China must deepen its reforms to achieve its oft-promised goal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by 2020, the resistance of entrenched interest groups must be overcome. More subtly, there is what some call a pervasive “soft resistance” – local officials who do not do their job and economic elites who migrate.

If reform had been progressing smoothly, then why strengthen central authority by investing Xi with the status of core leader? Xi has encountered obstacles; if there were no obstacles,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a core leader.

I have been speaking to party officials and theorists about Xi as core leader. In fact, the necessity of having a leadership core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expedite reform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of what I found to be four factors relating to Xi’s elevation.

A second factor is that not only does Xi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hina’s transformation, he is also accountable for it. Moreover, he has shown courage in confronting and dismantling a vast, corrupt system of bribery, patronage and illicit wealth accretion.

A third factor is that Xi as the core does not end, and even may not diminish, the cardinal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e party bolsters each of the concepts: encouraging the democratic solicitation of input and feedback from members, lower-ranked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and strengthening centralism through Xi’s leadership of the principal levers of power (his positions as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head of stat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head of the “leading groups” on reform,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et security).

A fourth factor is that a core is required to manage the party more strictly and thereby give members and the public more confidence. Witness Xi’s relentless and unprecedented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hich is altering how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dustry managers work and even think. Let no one assume that Xi’s battle against corruption has been risk-free.

Significantly, these four factors undergirding Xi as the core leader map onto his overarching political framework, his strategic blueprint called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reform, rule of law, party discipline.

Xi’s core status arises, we’re told, through the collective will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Becoming party core is not an automatic consequence of being general secretary; a core leader must fit the times and the status must be earned.

Speaking at a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s sixth plenum last month, Huang Kunming (黃坤明), executive vice-minister of the committee’s Publicity Department, said th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departments as well as the military all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Xi’s position as party core, adding that this decision

was “based on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and we feel keenly about it”.

Huang explained that “a core is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party will be the governing party”, describing it as significant for upholding the Central Committee’s authority and maintaining the central,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for its “staying true to its mission”.

Therefore, party theorists explain, Xi as core leader is more a ratification of reality than a shift of fundamentals.

What does Xi as core mean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It was Deng Xiaoping (鄧小平) who introduced the concept when he designated Jiang Zemin (江澤民) as “cor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central leaders, bolstering Jiang’s stature following his unexpected appointment as party leader in 1989. At the time, China was facing the dual impediments of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social uncertainty at home, and economic quarantine and diplomatic isolation abroad. As Deng pointed out: “Any leading group should have a core; a leadership with no core is unreliable.”

Only then did Deng retrospectively apply the novel term to Mao Zedong (毛澤東) and to himself, as cor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respectively. (Of course, Mao was so utterly dominant that calling him core during his lifetime would have seemed a demotion. Deng remained core even when he no longer held any official position.)

Today’s world is more complex. China faces threats at home and abroad. Volatility grows and uncertainty abounds – the Middle East and Donald Trump are offered as evidence. The need to secure China’s stability is more essential than ever, and thus to strengthen

Xi’s authority is a primary reason, I’m told, for designating Xi as core leader. Party theorists say China “urgently” requires a political nucleus that is sophisticated and nuanced, attuned to contemporary times. Though conditions now differ from those in 1989, Deng’s admonition rings timelessly true.

However, that a core leader is needed now does not mean one will always be needed. When China becomes a fully modernised nation, perhaps by mid-century, conditions may change again.

True loyalty is telling leadership in private what one really believes is in their best interests

I hear frequently of the “painful lessons of China’s century of blood and tears” and that for China not to have a tested and authoritative leadership core would be “unthinkable”. Party inner talk says “Xi Jinping has passed the test of the people” to be China’s political core, leadership core, and a core of the times.

Chinese scholars argue that “core” is a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 however inapplicable (even inexplicable) in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They call Western concerns that Xi as core leader means that “a new emperor is born” wildly unfounded, even paranoid. In feudal society, the emperor ruled unconditionally

with arbitrary imperial power, and in such a “command-obey” system, goes the argument, there is simply no need for a core.

Rather, given today’s party political structure, the concept of a core both strengthens cohesion and serves to prevent a personality cult, not to promote one. Having a core means acknowledging that the party system is not the “emperor system” – absolute power is rejected – and that the optimum system, at leas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s a combination of concentrated centralism and democratic collective leadership.

Corroborating this functional balance, in the communiqué issued following the sixth plenum,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system” is reconfirmed. It st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personal division of labour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must always be adhered to.” And it stresses: “Any organisation or individual shall, under any circumstance, not be allowed to violate this system for any reason.” The three “any’s” seem no accident.

Some analysts see contradic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communiqué calls for democracy and constructive criticism internally within the party. On the other, disobeyi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 is forbidden, backed by vigilant supervision and tough discipline.

Yet to read these statements as contradictory is to mis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here. Xi appreciates the complex and arduous tasks that lie ahead. He told me so a decade ago, and it is obviously truer today than it was then. The statements are harmonised, first, by the party’s motivation to seek optimum policies for the country, and second, by keeping most of the divergent views internal.

True loyalty is telling leadership in private what one really believes is in their best interests, not pandering and fawning by repeating what one thinks leadership wants to hear. Though there are concerns, no one here worries that Xi will become Mao.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nation and its second-largest economy. China’s diplomacy is expanding and its military is growing. From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facilitating trade in over 60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ts leading role in the UN peacekeeping forces, China, the “Middle Kingdom”, is involved in every meaningful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o, what kind of China do we want? Certainly not one with weak central leadership and fragmented citadels of power. With its huge and imbalanced population, and its divers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China today requires a leader with sufficient strength and prestige to secure social stability, drive economic reform, and guide it in being a responsible world power. Xi as core leader should be good for China and, thus, for the world.

Robert Lawrence Kuhn is a public intellectual, political/economics commentator, and 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ategist. He spoke at the launch ceremony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book,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and is the host of Closer to China with R. L. Kuhn, a weekly show on CCTV News produced by Adam Zhu

## The basic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Mike Rowse** says the continuing political tussles in HK illustrate the pain of being caught in a cycle of actions and reactions, and we must address the root cause of the grievances

There has been a considerable focus recently on the Basic Law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ir interaction. Perhaps neglected in the process has been a different but relevant concept: the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hereby an action gives rise to outcomes unforeseen by the instigator.

Hong Kong’s tortuous path towards political reform is a case in point. The first reference to the idea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comes in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promulgated back in 1990. Looking towards 1997, its purpose was to reassure. Naturally, attention turned to the subject in the early part of this century. While people understood that the move towards universal suffrage had to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the reform package put forward in 2014 was widely perceived as disappointing; the plan to stick with an un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deciding who could enter the race was unpalatable.

The State Council’s white paper on the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intended to set things straight, only stirred things up and led to the Occupy Central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let the action linger, hoping public anger would pay dividends in the 2016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While the 79 days of disruption did bring the protesters momentary opprobrium, memories quickly faded. In the election, the pro-government share of the vote actually fell, and the attack on the idea of independence led directly to a near 20 per cent share of the vote for a localist faction. This was surely not the objective.

Now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overturn the election outcome. The practice of banning some potential candidates from standing, then using all means at hand to unseat some of those elected, is a tactic mor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third-world countries following a military coup.

## Has something been lost in translation here? Perhaps we ne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ort term, the judicial review sought by the chief executive against the decision by Legco president Andrew Leung Kwan-yuen to give Sixtus Baggio Leung Chung-hang and Yau Wai-ching another opportunity to take the oath has been successful. Mr Justice Thomas Au Hing-cheung ruled in the High Court that their oaths were invalid, they should not be given a second chance and their positions should immediately be vacated. Many observers thought he might decline to rule at all, and simply refer the matter back to the Legco president. The problem with one arm of the administration delving too deeply into the processes of another is that it inevitably generates more requests to do so. And, sure enough, we now have legal challenges against more legislators, plus a challenge against the chief executive himself.

Given that, in the past, other Legco members who had politicised their swearing-in and then done it properly second time round were permitted to take up their seats, did Leung and Yau have a “legitimate expectation” that they would enjoy similar treatment? The Legco president certainly thought so, hence his original ruling. Now it is for a higher court to decide.

Meanwhile,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has sought to clarify Article 104 of the Basic Law, which requires all people concerned to “swear to uphold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wear allegiance” to it. But the interpretation is different: it talks of “a legal pledge ...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mphasis added). Has something been lost in translation here? Perhaps we ne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If,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 are two (or more) vacant Legco seats, then we are in by-election territory. I don’t think the people are fooled for one minute about what is going on. In each constituency, an impeccable opposition candidate will stand, win a majority, and take the oath impeccably. Unfortunately, this tragedy – or farce –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government starts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grievances over the lack of meaningful political reform instead of just hammering the symptoms, which generates new grievances in the process.

Mike Rowse is the CEO of Treloar Enterprises and an adjunct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ike@rowse.com.hk



A yellow umbrella, a symbol of the Occupy movement, is used in a recent protest against Beijing. Photo: Reuters

## Bring down the curtain on this idiotic political drama

If you’re tired of all the politics, I feel you. It’s draining, to say the least, especially when the melodrama in Hong Kong is dragging out; it has become downright dreadful when we know there is no respite in sight.

We were supposed to have a brief break after last September’s Legislative Council polls, before the next big event. Even though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cast a vote in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elections, less than a month away, and in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scheduled for late March next year, the city should by now be focusing on what’s ahead.

But, thanks to the two recently disqualified lawmakers, who lacked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ability and respect for oath-taking, our (albeit dysfunctional) legislature has basically been shut down for a month. The ugly politics that should have been insulated within

**Alice Wu** has had enough of the brouhaha over the oath-taking by two lawmakers. Now that they’ve been disqualified, HK must focus on battles ahead

the chamber once again spilled out onto our streets.

And what should have been decided and concluded on September 4 is now dragging on indefinitely, with two or possibly more by-elections added to the election overload.

Hell-raising politics is not going away any time soon, but the sheer stupidity of the localist pair’s actions really is one for the books – *Macbeth*, in fact: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 Creeps in thi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 And all our yesterdays have lighted fools / The way to dusty death. Out, out,*

*brief candle! /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 Signifying nothing.*

They were indeed full of sound and fury, and they did nothing for the common good.

What they did opened the door for an invitation to the courts to intervene. What they did presented an opportunity for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What they did, ultimately, may well become the precedent for other legislators to be similarly

barred. And that is why the duo’s pledge to spend every penny – and lest we forget, this also means the mounting cost to the public purse – to “appeal at all costs” is beyond rich, coming from them.

Clearly, they have yet to wrap their heads around the concept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Sixtus Baggio Leung Chung-hang is wrong in believing that their disqualification from Legco rendered the election meaningless. They have no one but themselves to blame for their defenestration. It is they who made the election meaningless.

And, to add insult to the grave injury they brought on the rest of us, they are asking for donations. At some point – if we’re not there already – we must take serious offence to be taken as fools, again and again. The curtain must now be drawn on this overly played-out second act.

The irony may be lost on the

pair but it’s pretty obvious who has been played for total fools. In case they haven’t noticed, the lawmakers who served as the duo’s chaperones have stopped babysitting them because there is no value in being their keepers any more. Escorting the duo’s Legco gate-crashing attempts served their purpose: to usher the two straight to their political end, and the votes the two rendered meaningless are now political spoils.

The two took the toxic brew and there will be no stay of execution that could stop those ready to contest their seats.

We must fight our political fatigue. We can ill afford to be distracted by those who continuously try to foolishly make their own stupid mistakes our collective problem.

Alice Wu is a political consultant and a former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Asia Pacific Media Network at UCLA



**CONTACT US**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opinions on this page? Write to us at [letters@scmp.com](mailto:letters@scmp.com)  
If you have an idea for an opinion article, email it to [oped@scmp.com](mailto:oped@scmp.com)

INSIGHT

Calling all hands

Robert Lawrence Kuhn says Beijing’s ability to contain the coronavirus should not be doubted

I take it seriously whe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nation’s highest authority, calls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a major test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 a phrase of such significance that in my 30-plus years of watching the country, I do not recall the like.

Let me explain why I am confident – why the world should be confident – that China will overcome the epidemic. I offer three reasons: commitment, competence, and readiness to change and improve.

China’s commitment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 which causes the disease now officially known as Covid-19 – is exemplified by the country’s astonishing mobilisation to stop its spread. The government is issuing strict and resolute directives.

Taoran Notes, a WeChat account linked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ut it this way: “Concentrated treatment and quarantine, if not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is at best a dereliction of duty, at worst a crime. This is not a question of willing or unwilling, should or should not, but of necessity.”

The whole country is marching to this music. This is China’s monumental “whole of society” commitment. In President Xi Jinping’s words: mobilising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whole army, and the whole party. China’s mobilisation is unprecedented in global health history. Nowhere could it work like it works in China. And the reason it works relates to how the party system works.

It is the same kind of commitment and mobilisation that the party has been using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since

around 2012, lifting the final 1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absolute poverty, coordinating party leadership and organisations at central government and five levels of local government – provincial, municipal, county, township and villag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s war on the coronavirus and its war on poverty are striking.

China’s competence to fight the virus is exemplified by the country’s unremitting implementation of its commitment: locking down Wuhan, a metropolis of 11 million people, and other cities, perhaps 60 million

“  
**The government must learn lessons from the outbreak to enhance its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or more people; house-to-house temperature checks; the party’s grid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al control; postponing the return to work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 break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travellers.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constructed hospitals of 1,000 beds and more, literally on green fields and literally in just days; medical team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rushed to Wuhan, includ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eploying at least 3,500 medical staff; China’s largest corporations, especiall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contributing to containment logistics;

and mainland scientists have rapidly sequenced the virus genome and shared the data globally.

China’s readiness to change and improve is a critical part of its governance system. When I discuss the five or so primary reasons for China’s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I always include the party’s willingness, albeit out of necessity, to admit and correct errors. Hence, in tracking this virus epic, I focus on the leadership’s forthright acknowledgement of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country’s response.

To stop the spread of virulent diseases, early action is essential. But how to develop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The challenge is handling an avalanche of information, from diverse public and private sources and of variegated and uncertain quality.

On the one hand, who can deny that false rumours can increase anxiety and trigger panic, destabilising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ecome brutally evident that suppressing information in the name of social stability can foment disaster. Early local efforts to play down the risks of the coronavirus delayed the response as contagion mushroom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eight doctors in Wuhan tried to alert authorities to the truth of the then unknown but fast-spreading virus, but they were reprimanded for “publishing untrue discourse on the internet”. Tragically, one of them, Li Wenliang, caught the virus and died, triggering an outpouring of anger and fury on social media.

Reacting swiftly,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authorised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the country’s top

anti-corruption body,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A strong, top-down system is effective at stopping rumours, especially with advanced IT technologies, but it is deficient at enabling diverse voices to surface vital truths about frontline problems early in the process. President Xi has pledged to rid the party of “formalism and bureaucratism”.

A potent example is when local officials fear acting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s happened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ecause they have not received directives from their superiors, and then, after they do receive directives, they overreact, because they put satisfying their superiors over caring for people.

Xi calls for “fighting the outbreak in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manner”. Transparency is the key. In fact, though there is complexity in verification, the government holds daily briefings, updating in precise geographic detail the number of new confirmed cases, deaths and recoveries.

China says it will improve its systems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feedback, error corre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The government must learn lessons from the outbreak to enhance its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Self-correction, the party says, is its hallmark.

If so,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look upon China’s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as a turning point in worldwide efforts to contain outbreaks of novel diseases and stop their spread, which globalisation and ubiquitous air travel has made vital. History may well thank China for pioneering how to deal with virulent contagions in a globalised world.

Robert Lawrence Kuhn, a public intellectual and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ategist, won the China Reform Friendship Medal (2018)



It pays to be cautious when applying to US universities

Lorraine Tong and Court Stroud say many American institutions face an uncertain future

Many mainland students see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ideal place for college, despite the current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economic superpowers.

But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need to exercise caution. A stark demographic drop is coming for US colleges. The US high school population, which has been declining, will drop significantly by 2026. This will strain an already financially stressed industry.

In nine years, the number of US students attending college is projected to plunge by 11 per cent or 292,000. In parts of the US, such as the Northeast (Massachusetts) and Midwest (Illinois), schools are already struggling with falling enrolments due to lower US birth rate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over 90 non-profit US colleges have closed, merged with other colleges or consolidated their administrations. Middlebury College, ranked seventh among liberal arts colleges in the latest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nd with a US\$1 billion endowment, eliminated nearly 150 staff positions by agreeing to be purchased to close a budget deficit.

Consulting firm EY-Parthenon predicts 800 colleges are at risk. *The College Stress Test*, by Robert Zemsky, Susan Shaman and Susan Campbell Baldridge, expects 40 per cent of four-year undergraduate schools to struggle or close.

Credit agencies Standard & Poor’s and Fitch have issued negative outlooks for U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ast year. Australia and Canada hold positive S&P outlooks.

Nathan Grawe, an economist at Carleton College, developed the Higher Education Demand Index, which projects college attendance for two-year, four-year and elite US universities in his book, *Demographics and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The decline is a sizeable change and will impact higher ed, barring any major policy changes,” Grawe says.

Every US state will face drops in college-bound students, except eight (Texas,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Colorado, Utah, Wyoming, Idaho and Montana). Every national and regional four-year and two-year school will face double-digit enrolment declines. Only the elite top 50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be insulated.

Given the risks, parents with children applying to college need to look beyond rankings, fit, or return on investment on majors when choosing schools. A struggling college focused on staying alive means uncertainty, limited resources and cuts.

Among the industry debate of “Will there be an impact?” and “Do parents need to know?”, some experts are building new financial assessments on undergraduate schools.

In May, from their work with the Massachusetts Board of Education, EY-Parthenon created the “student educational resource”, an assessment of a school’s ability to cover the cost of educating their admitted students through to graduation.

Last November, Edmit, a college advising company, built financial

assessments looking at expenses and assets of 964 US non-prof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mit agreed not to share the data after lobbying from the industry and lawsuit threats by individual schools.

*The College Stress Test*, coming this month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ill estimate market viability of individual four-year undergraduate schools by looking at a school’s past revenue.

“  
**Given the risks, parents with children applying to college need to look beyond rankings**

But international parents need to do their own homework, especially those spending a large portion of their family’s annual income on tuition.

Like any investor,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look at a school’s current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assess how well it is run for future viability. As a start, here are three areas and specific metrics commonly tracked by schools.

First, how good is the college at their core function(s) of teaching and/or research? If they are poorly run in key functions, they are likely to be poorly run

administratively. Look at the following for the school overall and by major/college: graduation rates, retention rates, teaching scores, number of books and articles published recently, research funding and per cent of external funding.

External funding is a quick measure on how competitive research and approaches are.

Second, how effective is the school in getting students to their goal of discovering a career, getting an advanced degree, or getting a job in their desired country?

Look at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using career services, satisfaction rates, and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graduating with a job or accepted to graduate school. Schools should publish these numbers so be wary of any place that does not.

Third, examine a school’s annual reports, which covers financials, risks and future plans. What percentage of revenues is tuition? Are there other revenue sources/assets? How consistent is it? Is the school covering its costs? What is its future strategy and does it have specific goals and plans? Lastly, read the school newspaper, which is often the first to report on issues.

As Grawe said, “When my 17-year-old was looking at colleges this year, I found myself much more interested in college financials. It’s an investment.”

Lorraine Tong is a marketing strategist to Fortune 500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start-ups. Previously, she was the director of digital and innov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he holds an MBA from 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ourt Stroud lives in New York City, where he works as a writer and consultant. He is an MBA graduate of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One overlooked fact about those cross-border trips

**Bernard Chan says thousands of Hongkongers go back and forth from the mainland every day and even government critics accept we cannot just switch off flow of goods**

Nearly 330 million passengers came in and out of Hong Kong in 2018 (the latest year for which we have figures). Around 250 million of these trips were overland to and from the mainland, and the rest were by air or sea to 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ven during slow periods, that’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every day. The majority of these trips are made by Hong Kong residents. They include large numbers who live across the border and commute here every day. There are local truck drivers, local people who have retired to Guangdong and are visiting family here, and locals visiting the mainland for business or pleasure.

This is the day-to-day reality of integ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A deep misunderstanding of this cross-border travel has become clear in recent weeks, as fears spread about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and various groups dema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essentially seal off the city from the mainland.

Some of these calls are probably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ere is also some anti-mainland sentiment, although more than 85 per cent of those crossing the border are Hongkongers who pose exactly the same health risk as mainlanders. But I am sure many people supporting this idea are sincer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and other authorities have doubt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vel bans and quarantines. Some experts think they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But let’s leave that aside.

It is simply not feasible for Hong Kong to completely shut its borders. Even many government critics accept that we cannot just switch off the flow of food and other goods coming in from the mainland.

There are administrative issues. To reduce passenger flow and tighten health screening, the government closed off six checkpoints with Shenzhen on January 30. Such closures have to be coordinated on both sides.

There are issues of fairness with regard to discriminating against mainland visitors: for example, it can mean keeping families apart. And, under the Basic Law, Hong Kong residents cannot be barred from entering or exiting.

“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failing in its duty if it overreacted and caused unnecessary alarm**

On February 8, the government took far tougher measures – closing all but three checkpoints and requiring a 14-day quarantine on anyone arriving from the mainland. The result has been a massiv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coming in from the mainland. But even with far lower numbers of arrivals, the mandatory quarantine brings new problems.

Officials are struggling to find suitable sites to isolate possible infected cases, especially as local communities are resistant to the idea of a quarantine facility in their neighbourhood.

Meanwhile, critics complain that a quarantine on residents relies to some extent on an honour system. Despite the threat of legal penalties and a system of spot checks, there is no reasonable way to be totally sure such individuals stay in their homes for 14 days.

Realistically,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 government could have acted very differently. As it is, the measures have caused disruption, and officials have been stretched by the quarantine.

Comparisons with Macau are misleading, as that city is far smaller than Hong Kong – but it has also not closed its border, and it also has a large workforce commuting there every day.

Most of all, we must try to keep all this in perspective. The government’s measures go much further than anything we saw during Sars in 2003.

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failing in its duty if it overreacted and caused unnecessary alarm. As the panic buying of rice and toilet paper shows, some citizens are nervous enough. Imagine the impact on public morale if – for example – the government physically locked hundreds of people in their own homes. Would we see residents fleeing their estates, or thousands of expatriates packing up and leaving?

It may be tempting to use this issue as a weapon against an unpopular administration. But it is far more helpful to the community if we all stay calm and rational, and get through this crisis together.

Bernard Chan is convenor of Hong Kong’s Executive Council



Thousands of travellers, mostly Hongkongers, arrive at Lo Wu station before the crossing is shut. Photo: AFP



## 强力反腐 为改革护航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政行动,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第四点,它有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个前提,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至关重要。第二个前提,中国必须实现深刻变革,比如经济方面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方面改善医疗和教育,减少地域差异。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明确、一贯和全面的领导,这种转变不可能实现。

一些外国分析人士和媒体认为,中国的反腐败行动是政治权力和控制的工具,这暴露了他们对中国的肤浅和单一维度的理解。鉴于国家的体量和复杂程度,中国领导人的每一项重要决定都出于多种考量。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政,加大反腐力度主要有6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要将腐败官员绳之以法。现在是法治社会,如果不尊重法律,没有公正的司法体系,就不可能管理好现代社会。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能够保证共产党高效地执政管理,做出对公共利益有益的决定,而不是被个人的利益所扭曲。

第三,加强纪律能够使共产党赢得公众信任,使人民对党更有信心。

第四,腐败官员经常阻碍经济改革和法治,经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改革和法治威胁到他们的私人利益。所以,惩治这些腐败官员有助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制度化。

第五,虽然绝大多数腐败官员只谋求保护自己个人利益,但还有一小部分人有政治野心,甚至不惜破坏社会稳定,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将他

们撤离领导岗位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这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第六,打击腐败,包括公开曝光和广泛教育,对整个社会都有利,可以提高道德水准和诚信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榜样,提高中国人民的福祉,培养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至关重要。

我听到有人抱怨说,反腐败会拖累国内生产总值,因为一些官员不愿意将自己置于聚光灯下,不愿冒着被调查的风险去做事。他们担心,现在做事多了反而有可能牵扯出对以前违规行为的调查。反腐行动也许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短暂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获得的好处是长远的。

有人认为腐败是中国强大的政府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产物,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腐败是世界性难题,只要有机会,就有人会腐败。很多国家都有腐败问题。中国官员腐败涉及的金额似乎很高。我认为,这与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创造巨大的、前所未有、甚至超乎想象的财富有关,政府能够支配创造财富的资源。用习近平主席形象的比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对症下药。

执行严格纪律有多重好处。例如,在我为中国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咨询意见时,如何处理腐败问题总是一大难题,重要程度仅排在知识产权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行动大大减少了这一担忧,使跨国公司在华做生意更便利,中国也更容易建立世界级的标准。

“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中的最后一点,是前三个“全面”得以推进和实施的基础。全面从严治党非常必要,但还不是全部。更大的挑战是如何使党的纪律制度化,遵守党纪应依靠制度来管理,制度应发挥系统性、一贯性的作用,为改善人民福祉和实现国家复兴不断注入动力。

(作者为美国公共学者、政治经济评论员、跨国公司战略顾问,本报驻美国记者张明辉采访整理)

## 佩戴党徽 越来越流行

尤里·塔夫罗斯基



在探索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旅行中,我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鲜红的共产党员徽章佩戴在胸前,其中不乏青年人。从1976年到苏联解体时,我一直是苏共党员,但那时候在苏联很少有人为自己的党员身份如此自豪。所以我和这些中共党员交谈时得到了许多真诚而有趣的答案。

在甘肃省张掖市的一个风力发电场上,一些年轻人回答我:“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们为国家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骄傲!我们自己的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连云港,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人党象征着为党的决策负责、为中国变成世界大国取得的成就自豪。比如,‘一带一路’伟大构想正在我眼前慢慢实现,成为一个全球级别的大项目。”

一位北京的中年学者入党已经10多年,但从去年才开始佩戴徽章。他说:“这些年开展的真正有力的反腐斗争让我对共产党的理想恢复了信心,让我充分感受到坐红旗轿车的人和骑自行车的我是平等的——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甘肃武威一个放射生物学研究中心,年轻的科研人员们都佩戴着鲜红的党徽。他们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保障国家科学技术研究走向领先水平。在中国梦的理想指引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看到我们能为这项伟大事业

做出贡献。”

在乌鲁木齐,我和一位老教授长谈了苏联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和俄中合作的前景,他说:“我们的党就像一只凤凰,涅槃重生之后比过去更美更强。和党一起走过了苦苦甜甜的岁月,我现在明白,过去几十年的牺牲和努力都没有白费,正确的战略方针保证中国在上拥有稳定的地位,给人民带来了安定幸福的生活。”

我一直在思考着中国共产党受欢迎程度剧增的原因。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实际问题、制定与国情相符合的长期规划方面表现出的能力是获得民心的最重要因素。对中国来说,“新常态”可以将庞大的国民经济带上现代化道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改善环境,建立成熟的内需市场。

同样,“一带一路”建设也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战略思想具有长远的前瞻性。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建立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体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积极为世界提出自贸区方案与互利合作项目。中国与中国的执政党身上不仅肩负着本国的命运,同样也肩负着全世界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前行。

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国家和执政党已经在世界上有了全新的作用。但随着党内教育的宣传推广,人民会逐渐对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力有更深刻的理解。那些自豪地佩戴着徽章的共产党员已经感受到了这一趋势,并且准备分担党肩负的艰巨任务,他们将和党共同迎来伟大的成就。

(作者为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本报驻俄罗斯记者曲颂采访整理)

# 让民众对国家更有信心

——外国学者眼中的『全面从严治党』

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使命,必须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党,激浊扬清,营造出党内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更获得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和爱戴。从严治党,让中国共产党焕发生机、不断前进,也赢得世界瞩目和肯定。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外国专家学者,他们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感受畅谈对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认知

## 打击腐败 要奖惩并重

杰弗里·里格尔



我经常前往中国访问,虽然与中央政府官员接触不是很多,但与苏州地方政府官员打过很多交道,特别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工作人员。他们视野开阔,无论职务高低,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今年11月11日,悉尼大学在苏州工业园设立了中国中心,这是过去5年来我们与中方共同努力、紧密合作的成果。我被指定为指导苏州工业园高等教育园区工作的外籍顾问之一,也是基于我们的良好合作。

我把个人收藏的很大一部分书籍,包括中文和欧洲语言的书籍,都捐给了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作为对我个人贡献的认可,图书馆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间非常优雅的阅览室。对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负责高等教育的苏州地方官员的担当和国际化视野。

中国执政党现在特别强调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很重要。当然,实际行动远比口号重要!在我看来,中国的执政党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各级官员在内心深处完全理解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现实和重要意义。

## 杜绝隐患 兴国平天下

黄载皓



因为在大学工作,我同中国大学、研究机构有很多交流。2013年起,我感受到中国发生了明显变化。中方主办研讨会,不再拘泥于形式,内容也更务实,连接待餐点也简单许多。特别是今年10月末,我去北京参加一场大学主办的研讨会,10位教授午餐只花了450元,这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八项规定。

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和包子铺的服务员攀谈,从他们那里我也感受到中国的变化。这些老百姓把从严治党理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为国家和民族率先垂范的努力,他们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

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核心议题,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驱动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正是这一切之根源,也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正解。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历史也证明了这是正确的选择。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呢?在我看来,一是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需要中国自身壮大能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这是中国构筑全球领导力的基础。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也需要正视来自内部的各种挑战。从严治党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的努力。三是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追求民族复兴,为实现国家产业化和现代化作出努力,并将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实现小康社会列为发展目标。

在韩国,为消除政府与财团间隐蔽的交易怪圈,韩国国会通过了《禁止不

## 社会主义 焕发新生机

埃贡·克伦茨



这一年我去了两趟中国,最近一次在北京的时候,恰逢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我还特意到1989年访华时去过的四川和浙江故地重游。所到之处,满目清新,不能不让人对中国的巨大成就肃然起敬。我发现地球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对面向2050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如此明确的设想。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风险,因为这条道路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去北京是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七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主题是“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位外国发言者认为,中国人不仅从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且吸取外国,包括民主德国的教训。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重新列入议事日程的时代。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而是面向未来、创造性地发展。在科学上,不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要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作出宣示。

我在思考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并未说他们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而是说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为初级阶段规划了一个很长的时段,实际上是一项百年世纪工程。这使我想起

正当请托与收受财物法》,即“金英兰法”。值得感慨的是,中国的反腐进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如果让腐败稍有喘息,它就会像毒蘑菇一般疯长,为了杜绝这一隐患一刻都不能松懈。

中国共产党今年迎来95岁生日,连续执政67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统性正是源于自身的改革。挖掉腐烂的部分需要很大勇气,也必然伴随着疼痛。反腐败是攸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我有以下四点理解:第一,中国共产党要维持自身净化能力。不仅要一扫党内腐败势力和机会主义势力,更应不忘初心。要加强党内管理工作,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提高预防腐败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维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二,共产党人要敬畏人民。党员干部是党内的中坚力量,应言行一致,发挥模范作用,成为改革的正能量。与此同时,要警惕从严治党动力不足、组织纪律松懈,尤其要注意不能远离民心。第三,对干部必须既严格教育、管理和监督,又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干事创业、大胆作为。第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树立政治新风。

中国有一典故,名医扁鹊见蔡桓公,见其有病,多次称能帮其医好病。但蔡桓公没有听进去扁鹊的话,最终病至骨髓,丢掉了性命。可以说,反腐倡廉是中国从严治党的象征,时机也同样重要。中国的飞速发展,直面的最大威胁正是腐败问题。在必要时,就应及时出手进行改革。

为了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境界,应彻底铲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要治党,治党要严厉。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兴国平天下,将让中国早日实现更大的梦想。

(作者为韩国外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主任,本报驻韩国记者陈尚文采访整理)

了瓦尔特·乌布利希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社会模式。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这次访问,我对中国共产党员的认识也加深了很多。他们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充满热忱。一位共产党员对我说:“我们的困难在于要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已成功地使7亿多人脱离贫困,当前任务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对不同级别的党委领导都提到过一样的问题: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最重要任务是什么?“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贫困。”他们的回答使我非常感动。

在我看来,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国家发展的命运,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于党员开展日常工作的重视。毕竟,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政党已经拥有逾8800万名党员,超过德国总人口。我认为,反腐的本质就是维护社会主义核心内涵,督促共产党员履行道德义务,发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每次从中国回来,我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德国人对中国了解得太少了,很多信息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如果真正想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目标,是一项百年世纪工程,必须着眼于长期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在生产和科技领域中迅速进步,使之有利于人民福祉。

(作者为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本报驻德国记者管克江采访整理)

本版责任编辑:李 琰  
电子信箱:rmrbgj4@126.com

制图:蔡华伟



读 环 球 人 物 获 人 生 智 慧

# 环球人物

GLOBAL PEOPLE



2006—2016

第5期 总第310期  
2016年2月26日

用人物记录时代

## 十年十人

10周年特别策划

www.hqrw.com.cn 邮发代号：82-667 售价：人民币10元 港币20元

中国邮政发行业务报刊





十年十人

政治

# 库恩

## 讲述中国政坛 10年变迁

□ 本刊记者 凌云

2016年1月11日，库恩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傅聪 摄）



本刊2012年12月(上)总第201期封面栏目文章

《库恩谈中共新领导人五大任务》

中国民众当前的生活水平更高、在各方面享受更大的自由，整个社会也更具活力、更加包容。但中国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挑战。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改变。那种依赖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制造业以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 人物简介

罗伯特·库恩，1944年生，美国投资银行家。自1989年起，在多个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他致力于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著有《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等多部著作。

**罗**伯特·库恩坐在北京君悦酒店贵宾厅的一角，左前方架着一部摄像机。镜头里的他，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眼神炯炯，深色条纹西装十分合体。他的语言风格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作家

式的滔滔不绝。

企业家、科学家、作家和主持人，这些都是库恩的真实身份。他曾是美国一家著名收购与兼并企业的总裁和联合创始人，其公司曾完成1400多项收购兼并业务，并为许多跨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但是过去10年，库恩把“讲述当代中国的复杂故事”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每年，他都要访问中国六七次，每次行程在3个星期左右，有时更长。“我超过1/3的时间在中国。如果有一段时间不来，我就会担心自己对中国有隔膜了。”库恩笑说。他的中文不断进步，并且在一位中国乒乓球教练的指导下，乒乓球也打得越来越棒了。





我们常说“旁观者清”，库恩，就是一位中国政坛10年变化的理性“旁观者”，同时也是位客观的讲述者。

#### 习近平告诉他：了解中国不能“盲人摸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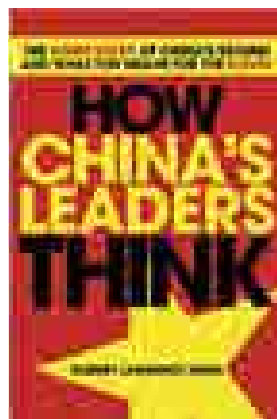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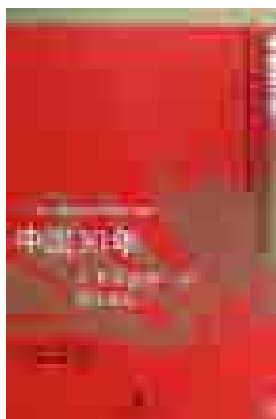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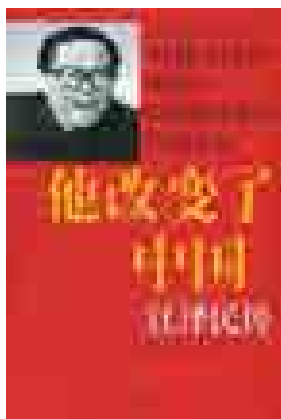
从库恩第一次到中国至今，已超过26年。2005年，他创作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畅销一时。2006年，他开始构思和写作另外两本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这两本书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出版。

2006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农业税取消，青藏铁路通车，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启。但后来看，这一年对库恩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可能是，继2005年首次在浙江杭州拜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后，他再次见到了

习近平。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

“2006年3月，我和长期合作伙伴朱亚当在杭州见到了习近平书记。”库恩对那次见面至今记忆犹新：“他告诉我们，外国人往往想用一句话来描述中国，或者把中国套进一个单一模式里。但这个国家太复杂，不能这样做。他特意讲了盲人摸象的故事。他说，摸到象腿的盲人认为（大象）是个柱子，摸到象背的盲人相信大象是一堵墙。他们都没有掌握真实情况，因为他们都没有触摸整个大象。他说，这个比喻很适合中国——一个有56个民族、富裕的沿海地区和贫困的内陆地区有巨大差异的国家。中国是个多样化的国家，只待在东部的人就像摸到象腿的盲人，只去西部的人像摸到象背的盲人。他建议我，研究中国既要横向地跨越多个地区进行考察，也要纵向地研究它的发展史。”

2009年1月11日，库恩携其刚刚出版的著作《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在上海书城7楼举行读者见面会。



库恩的著作：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中国三十年：  
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

库恩决定，按照习近平的建议到中国各地多看看。他和朱亚当去了许多省市，这一过程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后来在撰写《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时，库恩也将这种横向考察和纵向思考融入其中。他说，自己在中国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惊人的转变：中国从廉价产品生产者，到参与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科学、文化、政治、全球治理，迅速地改变其地位，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库恩眼里，中国最明显的变化是经济。“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惊叹，戏剧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变得更加开放、自信、成熟。

“复杂”，是库恩用来形容中国的词汇。伴随着发展奇迹，中国也出现社会不公、污染、腐败等问题。这些，被库恩称为“丰富而复杂的当代中国故事的一部分”，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另一个问题又变得严重。你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只盯着眼下的情况，而要看长期趋势。”

另一个词是“多样化”。他这样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多样化有很多类型，比较明显的是东西部的差别，都市和乡村的差别。我在北京、上海等中国的发达地区看到的基础设施是世界一流的。而当我去云南、甘肃等贫困地区的乡村，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这是一种多样化。另一种多样化是中国不同人群的不同思考方式。实业界、文化界、科技界、劳工群体，各有各的利益，都希望争取资源，扩大自己的利益。这种竞争对社会来说是件好事。

鉴于这种多样化，中国领导人强调，各地寻求增长一定要实事求是，立足于地方的现实和地方的条件。在一项新的政策广泛推行之前，要在基层进行深入的试验，获得经验并进行分析。”

### 官场的风气在改变

在中国各地，库恩接触了数以百计的政府官员，其中既有北京的高层，也有几乎每个省乃至地方一级的官员，比如安徽、云南等省的乡镇干部。他相信，自己与大部分中国官员建立了互信。他说所谓信任，不是告诉对方他想听到的，而是告诉对方真实的东西，并希望给予对方帮助。“这就是真朋友的意义，我希望做中国的真朋友。大部分中国官员确实关注民众利益，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坦率交流，直言相告。”

《环球人物》记者问库恩：“中美两国选择官员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强调的是从基层干起，逐级提拔。美国则采用选举制度。两种体系各自有什么优劣吗？”库恩说：“中国体系通过对官员的基层历练和层层选拔产生高层领导，长期来看可以确保政策的一致性。西方体系的优势是开放、透明的竞选，政府三个分支的监督和平衡，以及独立的媒体。一个体系的优势正是另一个体系的劣势。西方体系通过竞选取得正当性，中国体系通过历史选择和经济发展而取得正当性。”

在库恩眼里，中国官员的总体素质，即个人资质、专业培训和政治经验等条件，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大多数中国官员的共同点是，他们对所负责的地区情况很





了解，掌握详细的基层数据和具体的现实状况。我的专业背景是自然科学，所以对技术细节非常关注。”

几年的接触下来，库恩注意到一些基层干部的观念在进步。他说：“几年前，有一位官员告诉我，不能为了城里人能够呼吸新鲜空气，就让农村人生活在低水平之中。其实，他是以这个理由为兴办污染企业开脱。”如今，大家意识到这种思路不行了。农村和城市居民都要求享受新鲜的空气，而官员们责无旁贷。“现在我看到，提拔官员不仅要看发展经济的情况，还要看保护环境的成绩，这就是真正的变化！”

近年来党内实施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让不善饮酒的库恩非常高兴。“以前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我经常因为不喝酒而感到难堪。有一次招架不住一位副市长的劝酒，我喝多了，为此对自己很生气。现在好了，在新的规定下，我再也不必为不喝酒而感到压力了。”

在他看来，中国大力反腐对外企也是个利好，因为腐败曾经是外企在华经营的最大担忧之一。他们曾担心被迫参与贿赂，或怕不行贿会让他们的生意处于不利地位，如今这种担忧已大大减少。

#### 用中立的态度向西方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思想

对库恩来说，这些年最有挑战的是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并向西方读者解释这些思想。他直言不讳：“有时候，这些政策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很难弄懂的，我得花很多时间去解读。我希望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向西方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有时候我会被外界误解，认为这些是我的想法，其实并非如此。这些想法我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但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希望客观地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让人们去判断。”

为此，库恩大量研读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时刻关注领导人思想的变化，并不断与各级官员和专家交流。习近平曾告诉库恩，爱国主义和自豪感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发展感到骄傲，但中国的领导层不能满足于现状，不能过高估计成绩，要客观地评价自己，追求更高的目标。

2014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正式首发，库恩在首发式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说，这部著作强调提高人民生活、加强改革、法治和党的建设，向世界展示了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

（左图）2013年4月7日，库恩在海南省琼海市出席活动。

（中图）2015年9月17日，库恩（左三）在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出席“中美友谊屋”剪彩仪式。



库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习近平的最新政治理论，表达了他的治国理政思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途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原则，‘全面从严治党’则是行动。这不仅仅是新的理论，也是行动的蓝图。”

但他认为，发展不平衡制约了“全面小康”这个目标的实现。库恩说：“中国有3亿农民工，在他们亲手建起的城市里是二等公民，无法得到平等的医疗、教育和退休福利。所以习近平要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村移民可以平等地在城市生活。”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库恩也不断听到“啃硬骨头”“动了利益集团的奶酪”等说法。他注意到，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6项改革措施，这表明了高层坚定不移推动改革的决心，并向官员们发出了信号：必须专注于落实，必须有清晰的计划，并随时掌握一手情况。

在法治建设方面，库恩认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了诸多司法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司法体系尽可能免受干预。

#### 西方媒体开始承认中国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重要性

这些年，库恩撰写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作为《中国日报》和《南华早报》的专栏作家，向读者解释丰富、复杂、真实的当代中国故事。2012年以来，他还在BBC、CNN、《纽约时报》、彭博社等媒体接受了超过200次采访。他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著作，也得到西方读者的广泛关注。

库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读这些书的人都是对中国有兴趣的，其中有些是因为商业兴趣而看的，这些书和文章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对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来说，了解中国的政策非常关键。比如，‘十三五’规划对优先发展的产业做出计划，外国企业的业务如果与这个计划一致就能找到商机。”

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批评库恩，说他在书里只讲中国的好话，不说中国的问题。库恩直率地表示，自己不接受这些批评：“我会反问他们，有什么问题是我在书里没有触及的？别人的作品里可能有90%都在讲中国的问题，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到处是问题，而我的作品也许30%在讲问题，因为我想要尽量客观地讲述一个全面的中国故事。”

（右图）2015年11月20日，库恩（左）在上海出席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与担任论坛组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董云虎（右）握手。



**“中国梦和美国梦  
或者英国梦不一样，  
它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它也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梦，  
因为它将个人获得快乐、  
健康、丰富的人生  
置于和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同等重要的高度。”**

库恩承认，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形象差异很大。“在非洲一些国家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可能80%以上的人对中国持正面印象。在某些西方国家，也许只有20%的人这样看。在我关注的学术及商业两个领域，人们与中国的接触较深，总的来说正面观点居多，但也因为各种原因有矛盾，有些时候还比较严重。至于美国的普通大众，更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我曾经遇到一个美国蓝领工人，他听我说中国无意统治世界，连说‘太好了’。”

过去十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认可了中国在世界几乎所有问题上的重要性。”库恩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西方媒体的一个主要错误是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故事的主要部分，而事实上，中国的真实故事要复杂得多。要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就要解释中国的复杂。

#### 在西方，“我总是少数派”

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库恩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外国人常有的成见。对此，他通常会给出大部分外国人不知道的事实，来帮助人们突破偏见。“我经常在西方媒体上为中国的想法辩护，也在中国媒体上为美国的想法辩护——所以我总是少数派。”

对中国的成见之一，是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会让中国变得咄咄逼人，成为美国的威胁。而库恩认为首先应该理解，中国人的自豪感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中国的文化和技术曾经在过去数千年里领先世界。中国人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是激励中国人建

设国家的历史动力。所以习近平拒绝“中国威胁论”，多次表达中国始终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保卫祖国”，而不是搞殖民。

同时从现实的国际政治层面看，库恩认为，中国也需要敏锐感知美国和其他较小的周边国家的担忧。“中国应该认识到，自身的规模和力量本身就会令其他国家感到紧张。中国领导人保证无论中国变得多强大，都不会称霸，这是很好的。但较小的国家还是会担心将来中国是否会改变。所以，中国每一个外交或者军事决策，都应该预计其他国家的反应。”

对于中美关系，库恩认为中国的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美国有利。一是中国无意让国际秩序变得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一个政治、经济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二是中国承担起一部分维护世界和平和全球秩序的责任，对美国来说也是好事。美国有许多国内问题要处理，应该欢迎中国成为强有力的国际伙伴。

在2013年上海举行的中国梦国际对话活动中，库恩谈到他对中国梦的理解。他说，“个人的中国梦”包括了“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中国梦和美国梦或者英国梦不一样，它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也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梦，因为它将个人获得快乐、健康、丰富的人生置于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同等重要的高度。”

库恩说，“讲好中国故事”也需要不断创新和探索。2015年，他和朱亚当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在央视英语频道推出了一档周播的电视栏目《走近中国》，通过对中国领导人和决策者的访谈，讲述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故事。自2015年1月4日首播以来，已经播出60期节目，采访了诸多部长、副部长和著名专家学者，就世界想了解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出尖锐而具体的提问。节目内容涉及政治、政党、政府、国家治理、改革、法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国防等等。其中有一个系列《解读中国共产党》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它的理论和政策，组织和治理，愿景和挑战等。

作为一位中国改革的“旁观者”，库恩感受到中国正在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他的建议是，与其抱怨别人的不理解，不如直接参与到世界的舆论场中。这就是《走近中国》这个平台正在做的。C





Wisdom comes with Global People 读·全球人物 启人生智慧

# 环球人物

GP  
GLOBAL PEOPLE

第55期  
总第201期  
2012年12月6日

与中国友情深厚  
库恩谈  
中共新领导人  
五大任务

美国将军  
腐化生活

罗阳，没喝上最后的庆功酒  
何亮亮：“廉政公害不可复制”  
苹果设计团队的秘密领袖  
有种气质叫“挂纶模”



定价：人民币12.00元 零售每份0.80元



封面人物

COVER PEOPLE

与中国友情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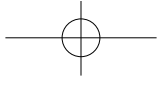
# 库恩谈中共新领导人 五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不仅关注十八大，还通过美联社、路透社等知名媒体，向世界介绍十八大与中共新领导人。

20 多年来，库恩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保持高度关注，用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并致力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十八大之后，库恩有了新的关注点：对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任务进行解读。







# 与本刊畅谈改善民生、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 库恩眼中的中国新时代

本刊记者 | 凌云

库恩一直关注中国。他认为，中国  
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10年前，中国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世界的  
4%，如今则占到了全世界的约1/10。这确  
实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除了经济，  
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外交，还是你能想到  
的任何其他方面，中国现在都是世界的中  
心。中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全  
世界人民的生活和工作。

最近，库恩目光的焦点是中共十八大  
后中国的发展。不久前，他主持的5集系  
列专题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上海  
首播，并计划在2013年由美国公共电视  
台播放。他还先后在《中国日报》、中央  
电视台及新华社的对外平台上接受采访，  
对中共高层的更替情况发表评论；并通  
过《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国际先  
驱论坛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  
美联社、路透社等美英媒体，介绍中共新  
一届领导集体，阐述十八大将给中国带来  
的变化。11月27日，库恩接受环球人物  
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中国未来发  
展的看法。

## 任务一：逐步解决人民“四大担忧”

来往中国多年，库恩很了解中国的民  
情，知道中国的热门话题是“幸福”。他  
引用孔子的话说，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  
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  
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而中国民众的“四大担  
忧”：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却  
阻碍着一些人幸福的实现。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农民工建设  
城市，并希望教育能改变他们孩子的命运。  
但即使那些成功的农民工家庭，他们的孩

中国的整个文化  
应该支持这些创业者，  
让那些充满创新意识  
的企业家得到公开的赞扬，  
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

子也无法超越当前社会的结构性障碍。

库恩：是的。教育的不公平严重破坏  
了成功机会人人均等的社会规则。农民工  
建设了这些城市，他们希望教育能够改变  
他们孩子的命运。但是，即使是那些成功  
的农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也无法超越社  
会的这种结构性的障碍。他们可能会梦想  
着上大学，但是他们不能。根据现行政策，  
农民工的子女仅仅能顺利接受小学到初中  
的义务教育，但是如果他们在要升高中的  
时候回到老家，他们几乎不可能通过竞争  
异常激烈的高考，只能选择职业学校。这  
意味着他们的职业很可能将同自己的父母  
一样——建筑工人、酒店服务员、保姆、  
厨师。

我曾参观过上海的一家农民工子弟学  
校，那里的孩子确实比在农村老家过得更  
好，但当他们长大后，意识到自己跟身边  
的上海本地市民并不一样时，会有什么样  
的感受呢？今天，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  
弟和留守儿童，称得上是中国的一个“民

族心痛”。

环球人物杂志：温家宝总理承诺教育  
投资将增长到占GDP的4%，您视之为“对  
中国未来的一个重大承诺”。

库恩：是的，但解决教育问题不仅仅  
靠钱。比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  
国的学生大都形成了遵从权威的习惯，学  
生挑战老师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在海外留  
学的理工科学生考试成绩很好，但在做实  
验方面差了不少。要改变教育领域的方方  
面面不足，中国的教育改革的，应该考虑  
如何让大学招生更少地依赖考试，如何让  
学生接受的教育更加个性化。这涉及对传  
统教育体系的改造，培养学生更高的创造  
能力和社会能力，并用新媒体技术来弥补  
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巨大不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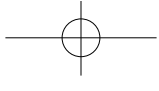
环球人物杂志：在住房领域，您注意  
到了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控  
制房价，但是又不伤害房地产市场。

库恩：高房价问题非常严重，让年轻  
人怨声载道。中国尤其应该关注住房领域  
的“夹心层”，这些人的收入水平没有低  
到申请保障房的标准，也没有高到足以自  
己购房。他们很难解决住房问题。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住房  
市场也不例外。但在现阶段的中国，政府  
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保障房的建设就是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它基本上是一个钱的  
问题，要靠政府统筹。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医疗保健呢？您  
曾提到，在上海仁济医院，很多病人候诊  
要等几个小时。

库恩：仁济医院的病人承载量是一天  
2000人，但现在每天接待8500人。中国  
的医疗体系就像这家医院一样，不堪重负。  
其中原因在于，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正经  
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这个过程中哪怕出



现微小的偏差，也会造成病人不满意，医生不满意，社会不满意，集中表现在出现了不少“黄牛”倒号、给医生送“红包”等不正常现象。

当然，中国医保体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农村地区极度缺乏医疗服务，医疗水平落后。不过，过去3年中，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13亿人，占中国人口的95%，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也能够为农民提

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环球人物杂志：**四大担忧的最后一个，是社会保障和养老，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库恩：**中国人不喜欢多花钱，更愿意把钱存起来，因为他们担心退休后的生计。我在上海看到，市中心养老院大多人满为患，这正说明了这种担心。养老问题和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一样，需要政府的支持。不过，公众的要求和预期，常常要

超过政府的财力所及。所以，公众也需要耐心和理解。

## 任务二：必须改变经济模式

在库恩看来，中国民众当前的生活水平更高、在各方面享受更大的自由，整个社会也更具活力、更加包容。但中国能否在世界经济动荡不已、资源相对有限、社会分化有所扩大的背景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挑战。库恩表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改变。那种依赖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制造业以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有很多企业，开始都是出口导向型，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海外市场，不少企业不得不倒闭。这是否说明了企业转入新经济模式的迫切性？

**库恩：**当然，只有转变了经济模式，才能尽快地提高利润，才能让经济主体从依赖低工资员工的低利润率企业，转变为高利润率企业——它们能够向员工支付较高的工资。低利润率企业只是简单地装配廉价产品，而高利润率企业则能够通过技术、品牌、客户服务等赚取较高的利润。我曾举过浙江新秀箱包公司的例子，这家企业开始一直在为一家国际品牌生产低成本箱包，利润很少，工人工资也很低。后来，他们加强创意设计，推出自主品牌，使利润率从此前的20%至30%上升到70%至80%，工人工资随之翻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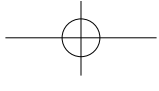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经提到过，中国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约60%的国内生产总值、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但不少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依然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在融资方面，中小企业只得到了15%的银行贷款。

**库恩：**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继续推进。大银行不贷款给中小企业，这发出的是不正确的信号。当然，中国的中小企业正在用互助式的地方融资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温州瓯海恒隆小额贷款公司，已为小微型的农企提供了40多亿元的贷款。它可以



2005年8月13日，库恩（中）在厦门市富山新华书店举行《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签售活动。





01



02

根据市场设定贷款利率，最高时曾是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今年，中国国务院还设立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让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建立新的经济模式、培育高利润率企业的过程中，除了企业界，其他社会各界能做什么？

**库恩：**虽然在企业经营中没有什么轻而易举的，但运作低利润率企业比较简单，而要创造高利润则充满了风险。中国的整个文化应该支持这些创业者，让那些充满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得到公开的赞扬，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社会应该将企业家视为与官员社会地位相同的人。

政府领导人则要了解高利润率企业的高风险性，去鼓励、带动在整个中国开展创新，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经济的转型从来不是简单和容易的事，每一个企业都要循序渐进，这个过程中，失败率很高，必须要能接受失败。

### 任务三：建设一个创新国家

库恩将能否鼓励创新列为中国领导人的第三个任务。在他看来，中国的领导人呼吁“自主创新”，然而，从一个以生产流水线为代表的制造型国家转型为以创新为驱动的创意型国家，道路注定非常漫长。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发明创造的能力。您的文章中也提到，

2011年，中国共申请163万件专利，包括52.6万件发明专利，名列世界第一。

**库恩：**但专利的商业化应用仍然是个难题。我去过深圳的大芬油画村，2000多名美术师在油画生产流水线上批量生产仿梵高、毕加索等伟大画家的作品，这里的复制油画占了全球油画市场的60%。然而，当金融危机来袭，海外订单骤降，许多工厂破产。画家们不得不转向国内市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完成了从“复制者”向“原创者”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我也向人们不断讲述黄岩的故事：这位31岁的专利经理管理着2000项专利，包括LED面光源以及低成本的3D打印机技术。他先确定市场需求，然后根据需求寻找专利，而不是拿着专利找市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创新要想成功，知识产权必须得到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可能是中国成为创新国家面临的最大、最棘手的障碍。以前，只有外国企业谴责侵犯知识产权，而现在中国的企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之中。

**环球人物杂志：**美国有发达的新科技，也有大量活跃的创新企业，中国能从美国学到什么？

**库恩：**还是前面说过的话，企业家必须被允许失败。创业失败不应成为企业家的事业终点，也不应令其蒙羞。当我运作

01 大芬油画村，以复制油画闻名。

02 2012年11月，深圳华强北商业圈已经成为手机行业的晴雨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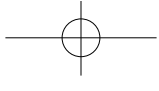
我的公司时，我总是告诉我的员工：“如果你的想法都是好想法，就说明你的想法不够多！”

### 任务四：让政府更加透明、负责

从库恩第一次来中国至今已有20多年，对中国政治的观察相当深入。他曾表示：“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人在物质产品和个人自由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但是，人们怎么才能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如何让政府更加透明、负责？如何让中国社会更加民主？这是中共新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之一。”

**环球人物杂志：**正如您注意到的，如今的中国人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也不愿回到一个封闭的社会。微博已经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以及发表观点的主要平台，新媒体是否可以帮助官方更好地了解社会和民众？

**库恩：**新媒体是有力的，其发展趋势无法逆转。中国领导人没有选择，必定要跟随民意。对中国来说，要保持共产党领



导的体制，新媒体是民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有效途径。正是有了微博，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开明与事实，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寻求正义的力量和途径。现在，微博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监督的全新形式。曾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影响了中国的慈善机构形象，温州动车事故也引发了铁道部的改革。当数百万的微博使用者都聚焦同一个话题，就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群体。政府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我还给不少人讲述过高中教师秦岭的感人故事。秦岭的父亲身患癌症，被多家医院拒收。他在网上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写了一封公开信，列举了上海医院面临的很多问题。数千人转发了这封信。当晚，俞正声就在网上回了公开信，表示要在对癌症晚期病人的制度关怀上有所改进。很快，上海就增强了医疗力量，为病危病人增设床位，肺癌等大病都列入医保范围内。

**环球人物杂志：**您很强调透明度，甚至认为“没有什么比透明更重要”。一位中共的高级领导也对您说过，透明是“党内民主”的关键。

**库恩：**我曾经引述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教授的话：“公民一定要知道政府是如何花钱的。”92个中央部委和事业单位在网上公开开支情况，就是一大进步。透明让

民众知道得更多，让官员谨言慎行，它在中国政治改革路线图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无论一些官员是否喜欢，民众都会加强新媒体监督政府的力量，而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是保持人民信心的关键。

**环球人物杂志：**但也有人担心微博会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被人利用。

**库恩：**这就是自由的代价，解决这一担忧的方法是将更多的信息公开，现在已没有回头路。毕竟，微博为中国提供了创造一个开放、公平、公正社会的机会。

#### 任务五：建立高水平的道德体系

库恩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也有过专门的研究，他知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的价值观一直以儒家道德为主，但“文革”期间，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忠孝美德遭到了破坏。此后中国开始发展奖励个人自主性的市场经济，而集体主义精神似乎也在渐渐丧失。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一些文章中，对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观谈得比较多，为什么？

**库恩：**我在与一些中国朋友聊天时，他们都对中国的转型表示自豪，但也经常自问“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2011年，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车祸死亡等事件的发生，加剧了人们

对信仰和价值观问题的担忧。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领导人也许不必操心人民信仰什么。在中国，经典的共产主义曾经试图取代传统的中国文化，成为全民的信仰。后来，市场经济又改变了这一点，造成了一些人信仰上的空白。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在生活和工作中缺乏传统道德，会令社会变得非常地粗鄙。

**环球人物杂志：**记得您讲过一位中国商人的故事，他先是整天忙着赚钱，后来健康出了问题，反思以后决定不再追求财富，要当慈善家，帮助1万名贫困儿童。无私精神是一种信仰吗？

**库恩：**在中国，无私帮助他人的人被称作雷锋。雷锋的意义在于他体现着个人品德，告诉人们应该乐于助人，同情弱者，遵守道德准则。而现在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这方面挑战，是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水平较高的道德体系。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很多人信仰宗教。

**库恩：**把雷锋作为信仰，与把孔子或者佛作为信仰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人们更多地关注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同特征，而不是教义的差别。只要一种信仰让人们去行善，那就是一个好的信仰。中国从未受到宗教力量的统治，虽然中国也有过频繁而血腥的战争，但没有一次是宗教战争。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一个多元社会，人们究竟应该信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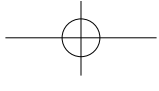
**库恩：**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是什么？各种宗教又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美国，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并相信爱国主义。但是，对于美国政治理念的信仰从未达到对宗教的信仰程度。

中国人如何树立自己的信仰，对我来说依旧是个问题。虽然很多人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但是没有哪个是最令人信服的。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本文参考了张正富翻译的库恩文章，特此感谢。）



2012年6月5日上午6时，广东佛山一医院里，市民排队挂号。





# 15岁直读大学，从企业并购起家 美国来的“多面手”

本刊特约记者 | 曹工文

68年前，库恩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纽约一家时装成衣公司的老板，曾任美国时装协会主席。他的母亲是一个较为传统的犹太女人，结婚之后就没再去上班，一直在家相夫教子。

由于库恩的右眼先天性失明，父母就没有送他去上学，而是请来家庭教师在家教他。这样一直到了15岁，库恩跨过小学和中学，直接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该校是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注重学术自由，对各种学术思想兼收并蓄。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人类生物学学士学位后，库恩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人脑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才22岁。这一资本，使他后来顺利成为了一位大脑科学家。

在做研究的同时，库恩还学会了德文、法文和希伯来文。

1972年，库恩在美国世界上帝教会赞助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人脑和动物脑会有区别》的文章，得到教主伯特·阿姆斯特朗的赏识。随后，他成为该教会的主要成员。其间，库恩还出任教会主办的一个结合时事和经文的国际传教电视节目《明日世界》的制片人。短短几年之内，在他的积极协助下，该教会把一个地区性的宗教电视台，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媒体王国。

1978年，世界上帝教会因为首领无度向教众敛财，一度被美国加州警方取缔。此后，教会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权力内讧，库恩也因此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此脱离了该教会。后来，库恩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进修，并于1980年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在斯隆商学院，库恩建



上世纪70年代，库恩夫妇和孩子们在一起。

立了广泛的人脉。他的同学中有很多亚洲企业高管，这使得库恩毕业后很快得以进入商界，并迅速将发展方向转往亚洲。

库恩在商业上一起步就是“大手笔”。上世纪80年代初，他先后帮助日本的三井、长期信贷银行、住友信托和后来的日商岩井等企业大量收购美国资产。在这一系列的并购交易中，库恩获得了较为丰厚的佣金，逐步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

库恩后来还成为了美国日内瓦公司的总裁。由库恩和他的合作伙伴创建的日内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经营中型企业资产评估和兼并与收购的投资顾问公司。2001年，日内瓦公司被花旗集团收购，成为花旗集团成员企业，库恩也成为花旗集团高级顾问。

不久，库恩又成立了一个投资顾问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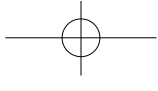
基金管理公司，即库恩环球资本公司。该公司在美国和国外有多个投资企业，其中包括下属的传媒和影视制作公司帕克维传媒公司及库恩传媒集团。帕克维传媒公司主要在美国经营电视剧节目的制作、影视节目的发行和卫星电视频道的经营，同时也协助一些国外媒体在北美地区开展落地和业务拓展工作。

库恩传媒集团承担着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大型访谈栏目《走进真实》的制作。库恩是该栏目的创建人和主持人。库恩通过采访世界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和知名学者，讨论和辩论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后来，库恩又发起成立了库恩基金会，并出任董事长。该基金会主要支持和赞助文化、科学、教育和人文事业项目，包括新科学知识的传播，大学科研专项奖学金，在世界各地赞助古典音乐演出和相关的影视节目制作和发行，推进中美友好文化交流和培训教育活动。

库恩还就高新技术的商业化问题为美国、德国、以色列和中国政府做咨询顾问。上世纪80年代末，库恩来到中国。自此，他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库恩的妻子朵拉·赛维亚里安，是一位专门演奏哈恰图良钢琴协奏曲的钢琴家，曾在2005年、2006年先后与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进行过合作演出。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阿隆是一位电影剪辑师，小儿子亚当是一位电影融资制片人，女儿丹妮拉则是一名演员和主持人。他们曾经一同参与过父亲和中国方面联合制作的《探索中国》、《重新发现中国》、《中国》等大型电视纪录片。G



## 写过《江泽民传》，与习近平两次会谈 钟情中国20年

本刊记者 | 肖莹

作为一个美国人，“中国通”库恩在20多年中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并力图在太平洋上架起一座中美友谊的桥梁。他见过不少中国领导人，真正接触后他发现，“这些领导人是很好沟通的，也是很好的聆听者”。

### “到了中国就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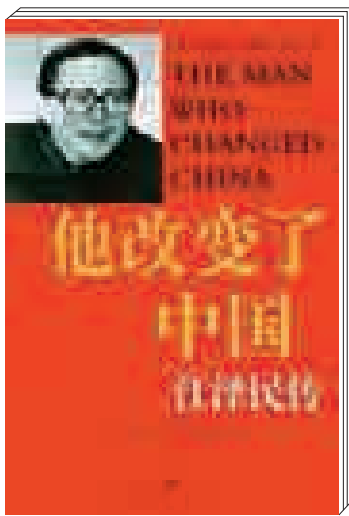
1989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想在中国做“星火计划”。他知道自己的好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乔治·科内斯基博士是位有名的科技园创立者，还是科技创新中心的推动者，便向他提出个要求，希望能推荐几位专家提供一些科技咨询，帮助中国发展科学事业。乔治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学生库恩。

于是，应宋健的邀请，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住的是钓鱼台国宾馆，“作为国家科委邀请的客人，接待规格非常高”。

首次中国之行，库恩只参加了一次高科技产品商品化会议，并在会议上做了一场关于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报告。一年后，库恩再次应中国国家科委的邀请来到中国，为海南岛的发展战略提供建议。

此后，库恩百余次来到中国，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科技部、原国家体改委、原国家经贸委、原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为有关部门的资产重组、国际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多年后，他曾这样描述自己“钟情”于中国的原因：“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我。”

库恩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中华大地上，



2005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

从首都到边疆，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有朋友形容他：“到了中国就兴奋，哪怕是和看大门的聊上几句，他也愿意。在内蒙古，他和牧民相处时就像与合作多年的大老板一样亲密。”他自己却说：“中国变化太快了。我每次去都好像到了一个新的中国。我要尽快把这些记录下来，写出来，让所有美国人都知道，还要把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些经验和先进技术尽可能多地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

### 3000万字的“大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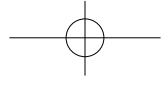
1998年，库恩出资150万美元，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全方位反映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其中有成果，也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000年9月，该片在美国全国公共电视网357个电视台同时播出，

引起极大反响，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飘来。许多人对他们看到的中国非常惊讶：“怎么中国人现在也西装革履、打领带，而且和美国人穿得一样高档？他们穿的不都是灰色服装或中山装吗？”“那些企业家，电话、手机同时接，和美国没什么区别，他们是不是你们雇来的演员在表演？”“有些地方怎么那么发达，是不是在美国拍的？”“企业破产，工人下岗，他们怎么敢随便发牢骚，那里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吗？”该片因为用事实极大地修正了许多美国人对中国认识的偏差，被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为“最为生动介绍中国社会变化的节目”。

巧合的是，就在节目播出前不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受了美国著名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讲述了自己接任总书记时面对的各种压力，以及他的生活和经历。很多西方国家首脑对华莱士的犀利提问都有几分畏惧，江泽民却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节目在美国播出时，库恩和朋友守在电视机前。看着看着，他突然意识到，节目中对江泽民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而自己也许可以通过客观描写江泽民的一生，向世界展现20世纪中国的真实变迁。

这样浩大的工程，要做起来是很难的。幸而，库恩获得了宋健的全力支持。在宋健的引荐下，他与一些政府机构建立起了联系，从一些专家学者那里拿到权威的历史资料，并辗转与一些重要人物展开了对话。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江泽民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汪惠炯等人，都接受了他的采访，并向他讲述了江泽民不同时期的故事。库恩告诉每一个采访对象自己的采访意图，然后满怀激





2006年3月，库恩在浙江与习近平会谈。

情地与他们聊天，再从庞杂的素材中挑选自己需要的故事……

库恩坦言，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自己与江泽民仅仅在公开场合见过3次面。“1993年，江泽民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住在古巴国宾馆，当时，我也在那里。我站在走廊上，而他正好也走了出来。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2000年9月，江泽民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千禧年首脑峰会，他在一次招待会上第二次见到江泽民。3年后，库恩又在北京听了江泽民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尽管没采访到江泽民本人，库恩却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他看来，这本书只是传记而非自传，没必要非采访到本人。

为了完成这本书，库恩总是随身带着手提电脑，一有空就开始写作，从周一到周五，他常常工作至凌晨。每当他在吃完饭后一头钻进书房，妻子总会调侃他“又去见江泽民了”。整整4年，3次重写，5次编辑，库恩光资料就搜集了3000万字，第一稿70万字……

2005年，一本47万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首批印刷的20

万册，仅10多天就销售一空。为新书做巡回推广时，由于签名数量太多，库恩的手肘甚至有些劳损，“影响了打网球”。

### 走访中国40多个城市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成功，让库恩有了进一步探寻中国整体形象的想法。他于是带着助手，开始走访中国40多个城市，进行深入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就是在这次调研过程中，2005年2月26日，库恩在浙江西子宾馆见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习近平向库恩介绍了浙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并感谢库恩多年来从自己独到的角度研究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在中美两国之间搭起了文化的桥梁。

次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浙江，这一次，他的目的是了解“浙江模式”。虽然是不期而至，但习近平仍挤出时间与他见面。习近平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感激之意”。

库恩回忆说，习近平在那次谈话中强

调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句老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一个月不来，半年不来，中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他又补充说，‘但如果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来分析，又不会惊讶于它变化之快，因为我们经历了几千年才走到这一步。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一速度，中国的发展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推动的。’”

让库恩印象最深的是，在谈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时，习近平提出，中国的情况无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或用单一的方法来概括，并借用中国古代寓言“盲人摸象”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把中国富裕的东部沿海比作大象的腿，而将中国广袤的西部比作大象宽阔的后背，认为‘象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必须全面地了解，要避免犯盲人摸象的错误’。”对库恩来说，这样的比喻是新颖而有用的，这个说法，他到现在还记得。

接连的调研，让库恩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007年12月9日，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提议，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库恩知道，这次又说到他心坎上了。

库恩列出了一份庞大的采访名单，每次采访前，他会向被采访对象提供三四十个问题的采访提纲，后者通常会选择其中的二三十个作答。采访结束后，库恩再根据采访录音进行整理，并对其中提及的年份、数字和事实进行核实。

在与100余位省部级官员、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沟通交流，并采访了诸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后，库恩用5个月时间完成了80万字的初稿。“我的家人说，整整一年，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后脑勺。”

2008年12月，《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文版在中国发行。第二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该书英文版在全球出版发行。截至目前，这本书是唯一由外国人详细描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程的书籍。G



## BBC World News

### President Xi Jinping-NPC Closing Session

Robert Lawrence Kuhn

March 20, 2018

**HOST:** Well joining me now from Beijing is Dr. Robert Lawrence Kuhn, adviso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uthor of the book *How Chinese Leaders Think*. Thanks so much for joining us here on the program. Usually the NPC is seen as sort of a choreographed event: we know what to expect. But this time it felt very different.

**RLK:** It certainly was different. You have to look at this year's National People's







**President  
Xi Jinping**

**Major Speech**

**Seattle**

**September 24, 2015**

**Robert  
Lawrence  
Kuhn**

**Simultaneous  
Commentary**



# CNN'S AMANPOUR – May 29, 2013

##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mee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 Interview with Dr. Robert Lawrence Kuhn, long-time adviser to China's leaders.

<http://edition.cnn.com/video/#/video/world/2013/05/29/exp-race-china-us-amanpour.cnn>



CHRISTIANE AMANPOUR, CNN HOST: Good evening. I'm Christiane Amanpour. There may officially be only one superpower today, but another is rapidly advanc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jockey for position at the pinnacle of the world in what might just be called a race to the top. So how will the first tete-a-tete go between their leaders, the two most powerful men on Ear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China's leader, Xi Jinping, will meet just over a week from now in an informal setting at the aptly named Sunnylands Estate just outside Los Angeles. China is anxious and angry about Obama's much-touted "pivot" to Asia and about what China perceives to be the U.S. siding with Japan over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part, has a laundry list of concerns, everything from alleged Chinese hacking of even its most sensitive military secrets to its influence over North Korea and Pyongyang's nuclear saber-rattling. President Xi say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t a crucial juncture and he says that he wants to forge,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So what exactly will that look like? We need to know because this may just be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today. And in a moment, I will dig deeper with Robert Lawrence Kuhn, a long-time adviser to China's leaders.

AMANPOUR: Robert Lawrence Kuhn has tremendous insight into China's leaders. He's a long-time advis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s met President Xi several times and he's the author of the book,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That is a big title. Welcome to the studio.





# Fareed Zakaria GPS

##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 Robert Lawrence Kuhn

October 5, 2014



FZ: What in the world is the leader of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on the planet thinking? That's a question many would love to know the answer to, but in a closed, secretive society, like China, it's all but impossible to know. He rarely gives interviews, and the press in China is far from free. But now we have something to look a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a new book, entitled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and it's aiming for worldwide impact. State media there reports that the book has been published in nine languages: Chinese, English, French, Russian, Arabic, Spanish, Portuguese, German and Japanese.



My next guest, Robert Lawrence Kuhn, says it is a milestone. Kuhn has advi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wenty-five years, and is the author of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Welcome.

KUHN: Pleasure to be here.

FZ: First, give us a sense of who this man is for our viewers. Who is Xi Jinping, and why is he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China's ordinary leaders?



KUHN: Xi Jinping has been involved in all aspects of what makes China today. His father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ountry, truly a great revolutionary and a great reformer in the early days. Xi Jinping graduate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s MIT'], with a degre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n he went through more than two decades working at the local level. Starting in a county, and then a city, Xiamen, working his way up for many years in Fujian province, becoming the governor. Then for five years Xi was the Party Secretary of, the number one official responsible for,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is the center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o that gives him a great sense of business. And that was when I first met Xi Jinping, actually, in 2005, and then again in 2006, seeing him doing the real work of running a province, a local area.



President Xi is a person, when you see him, who is unassuming; he's big, he has a strong presence in a room, but you feel very comfortable with him. He doesn't put on airs, he's very warm and

## Last word

# The insider with an outside view

STRATEGIST, BANKER AND AUTHOR HAS INTIMATE KNOWLEDGE OF CHINA — AND ITS LEADERS

By ANDREW MOODY

andrewmoody@chinadaily.com.cn

Robert Lawrence Kuhn says the West often doesn't underst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key priorities for China. The 67-year-old American is seen by many as one of the few figures outside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who actually does.

He is regarded as a knowledgeable insider, having been an adviser to a number of leading Chinese bodies since the late-1980s and knowing many of the country's top political figures personally.

"There is rarely alignment between what topics China's leaders think are important about China and what the world thinks," says Kuhn, also 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ategist and investment banker. "Understanding China requires knowing the difference."

He was speaking recently in the five-star Grand Hyatt hotel in central Beijing, which is his home for 90 days a year. The rest of the time he divides between his three h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aveling elsewhere.

"They treat me very well here. Even when I travel around China, I keep a room here," he says.

The hotel is well placed near to China's seat of government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where he has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contacts.

His latest book,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Leaders*, which is now out in paperback and more than 500 pages, goes into extensive detail about those who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haping modern China.

Kuhn, who cuts a dapper figure, says many in the West often have an outdated view about modern Chinese leaders.

"The reality is that China's leaders are meritocratic," he says.

"Many have strong academic backgrounds from top universities and all have significant experience, often having run two or more provinces or major municipalities as Party secretary, governor or mayor."

Kuhn, who is also a new China Daily columnist, is much in demand from major news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V appearances on BBC, CNBC, Euronews and Bloomberg TV, and says he has had complete freedom to express his opinions.

"I have written three books about China, dozens of articles and columns; I've produced two major TV documentaries about China and given scores of media interviews — and never has anyone in China even requested to censor anything I've published or broadcast outside of China," he says.

Some in the West, however, have accused him of being too much of an insider and not giving the full picture about China because he was too close to the leadership.



Robert Lawrence Kuhn says China's growth is good for the world, but it cannot save the world.

FENG YONGBIN / CHINA DAILY

"I deem it vital, considering China's importance in the world, that China's leaders become more known to the world, and known not just via sound-bites and photo ops, but by seeing them up-close as real people — hearing their own words, listening to their stories, getting their ways of thinking. I'm pleased to facilitate some of this," he says.

"I also offer my own analysis. As for my accuracy and understanding, readers or viewers can judge for themselves."

Kuhn, who was born in New York, began his career as a scientist. After studying biology at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he did a doctorate in anatomy and brain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in the 1960s. Brain science and consciousness remain major interests of his.

His first involvement in China was through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the late-1980s when he worked with scientists reforming China'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base. He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Song Jian, then a State councilor and chairman of the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At the time he was developing a parallel business career and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Geneva Companies, a leading U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ompany, which he eventually

sold to Citigroup in 2000.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cementing links with leading business and political figures in China.

His organization, The Kuhn Foundation, with CCTV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produced the documentary *In Search of China* for PBS in the US, which was broadcast in 2000.

He is now working on a new five-part series *China's Challenges*, which will be broadcast in China in the autumn and syndicated to PBS stations in the US next year.

Perhaps Kuhn's most significant project was writing a biography of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which was the best-selling book in China in 2005.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wa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more than 100 leading Chinese political figures, some of whom he has known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 know many personally and have worked with several for a number of years. When you hear them speak over a period of time, it gives you a sense of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character as well as their intellectual capabilities, leadership style and political progress," he says.

Kuhn sometimes likes to invoke humor to explain why there is sometimes fri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leader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because

of ideological, historical or cultural reasons that we hav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s I once pointed out, perhaps it's because China's leaders, the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ere trained as engineers, and most American politicians were trained as lawyers. Maybe the problem is that lawyers and engineers can't talk to one another!"

Kuhn says the main focus in the West is ofte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whether it will continue to motor ahead.

"China should have 10 to 20 more years of what we should still call relatively high growth, driven by continuing the country's unprecedented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Growth rates will naturally ease from reform's historic averages — probably to 6 to 8 percent per annum — which is less than we are used to, but which may be optimal because China can more effectively deal with its most severe problems, particularly economic and social imbalan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China's economy is fragile, vulnerable to exogenous shock. China's growth is good for the world, but it cannot 'save the world,'" he says.

Kuhn says there is often a danger of China being misrepresented because it is seen through a narrow perspective.

## BIO

### ROBERT LAWRENCE KUH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ategist, investment banker, senior adviser to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author

Age: 67

#### Education:

- Bachelor's degree in human bi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64
- PhD in anatomy and brai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68
- Master of sciences in management,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1980

#### Career:

- President and co-owner of The Geneva Companies, a US lead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ompany (sold to Citigroup in 2001)
- Chairman, The Kuhn Foundation, which produces documentaries on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s well as on China issues
- Author of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and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as well as 25 books on business strategy, financ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Books:** *The Inflationary Universe: The Quest for a New Theory of Cosmic Origins* by Alan H. Guth, *Lake Views: This World and the Universe* by Steven L. Weinberg, *The Coherence of Theism* by Richard Swinburne, and *Infinite Minds: A Philosophical Cosmology* by John Leslie. Books on consciousness by John R. Searle, David J. Chalmers and Colin McGinn.

**Film:** *Khachaturian* (2003, directed by Peter Rosen; Dora Serviarian-Kuhn, executive producer)

**Music:** *Piano Concerto in D-flat Major* by Aram Khachaturian (1903-78) played by Kuhn's wife Dora Serviarian-Kuhn

**Food:** "I eat tofu all the time. I appreciate the unbelievably different textures."

"Western media takes China's very real problems and reports them as if they were, say, 80 percent of China's story. I take the same problems — which are genuine and often intractable — and they consist of, say, 35 percent of my work," he says.

"It is not that Western media is conspiratorially biased or always anti-China, it is that they often do not provide proper and sufficient context," he says.

*Huang Tiantian, Dong Fangyu and Zheng Yibing contributed to this story.*

